

全球智库半月谈

印度是否利用发展融资与中国竞争？一项次国家层面的分析

欧元区经济疲软的结构因素

美国军事实力确保金融主导地位

限制进口墨西哥汽车将损害美国制造商

未来特朗普的需求，而非规则，将主导美国贸易政策

中国废塑料进口禁令对欧盟政策的启示

绿色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型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与非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本期编译

廖世伟

申劭婧

王琬婷

熊春婷

张丝雨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弦	大宗商品
	陈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燕	俄罗斯政治
	任琳	全球治理	丁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王琬婷 邮箱：wangwanting@ucass.edu.cn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印度是否利用发展融资与中国竞争？一项次国家层面的分析 6

导读：中国和印度日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本文探讨印度是否利用这些金融工具与中国（反之亦然）在地缘政治和商业影响力方面展开竞争。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涵盖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印度政府在海外资助的项目，并将其与中国政府资助项目的数据结合。本研究对 123 个国家中 2,333 个省份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在前一年为某个地区提供了政府融资，印度的进出口银行（Exim Bank）更有可能在该地区开展项目。由于这一效应在中国在某些国家相较于印度获得了更多舆论支持，以及两国贷款方在出口结构上相似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本研究将此解释为印度与中国竞争的证据。相比之下，本研究没有发现中国通过共同设立项目来利用官方援助或信贷与印度竞争的证据。

欧元区经济疲软的结构因素 11

导读：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增长模式的困境，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无法获得廉价俄罗斯能源带来的严重影响。然而，欧洲在后 COVID 复苏中落后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财政联盟和债务积压，导致反周期刺激不足，这也是欧洲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落后于美国的原因。若没有财政协调和必要的改革，欧元区可能面临“日本化”风险，即在低增长下依赖央行收益率上限维持高债务水平。

美国军事实力确保金融主导地位 16

导读：美国在军事和金融两大领域都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本文通过博弈论模型展示了全球美元的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称之为“过度特权”——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双重霸权使其能够以极低的利率为国防开支融资，同时巩固其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并支持其海外盟友。然而，这种特权并非必然或永恒，它脆弱地依赖于全球力量动态的稳定。

没有免费的贸易税：特朗普承诺的关税将影响大量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学品的贸易流通 20

导读：特朗普关税政策计划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关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关税将推高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玩具等领域的进口商品价格，同时增加美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若扩大自由贸易伙伴，还可能影响化工产品和燃料等重要领域。关税政策可能引发贸易报复，增加消费者负担，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同时削弱市场竞争力，对整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限制进口墨西哥汽车将损害美国制造商 26

导读：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计划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征收极其高额的关税，除非墨西哥政府承诺控制移民和毒品越境。然而，由于当前汽车制造业的深度整合，这一举措将同样重创美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了避免双输，特朗普政府应该在正式决策前与美国产业界和墨西哥政府进行磋商。

未来特朗普的需求，而非规则，将主导美国贸易政策 30

导读：在过去 80 年中，国际贸易关系主要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遵循既定规则来推动，各国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进行合作与谈判。然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从基于规则的谈判转向基于需求的“权力政治”模式。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强调通过具体的需求来施压其他国家，而非依据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或国际贸易规则。这种以“需求”为主导的政策架构，标志着美国对国际贸易秩序的定义，突显了大国博弈而非传统法治原则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特朗普第二次总统任期的临近，国际社会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政策范式，全球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聚焦中国**新风险而非去风险：美国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挑战 32**

导读：石墨对电池、炼钢等行业至关重要。随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寻求降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风险，他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事实：降低风险是一种用词不当的说法。美国正在做的是新的冒险：用来自中国的熟悉风险取代前沿市场中更模糊、更不为人所知的风险。

中国废塑料进口禁令对欧盟政策的启示 35

导读：2017 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这导致塑料垃圾在国家之间的大量重新分配。本专栏讨论了欧盟计划对《欧盟废物运输条例》进行改革的经验教训。虽然欧洲内部的废料贸易总量并没有因为禁令而增加，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在废料处理过程中存在“废料避风港”效应。欧洲内部法规的统一可以帮助减少向低监管国家的外包，而对可回收材料含量的强制性要求可以解决禁令可能会增加废料处理量而不是回收量的担忧。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与非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39

导读：在过去 15 年中，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大幅增加，主要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本文表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与非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参与度增加有关，特别是在下游领域。因此，中国的贷款可能有助于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长和生产提升。

经济理论**绿色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型 43**

导读：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将涉及将劳动力从高污染行业重新分配到“绿色”工作岗位。为了尽量减少这一转型对个人和社区的负担，政策需要支持被解雇工人的再就业，同时管理污染行业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结构性和政策性因素在塑造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作用，并揭示了各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教育是从非就业状态向绿色工作转型的最重要个人驱动因素，而地区之间在产业专业化上的差异要求采取基于地点的政策干预。

本期智库介绍 46

印度是否利用发展融资与中国竞争？一项次国家层面的分析

Gerda Asmus, Vera Z. Eichenauer, Andreas Fuchs, Bradley Parks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中国和印度日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信贷。本文探讨印度是否利用这些金融工具与中国（反之亦然）在地缘政治和商业影响力方面展开竞争。为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涵盖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印度政府在海外资助的项目，并将其与中国政府资助项目的数据结合。本研究对 123 个国家中 2,333 个省份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中国在前一年为某个地区提供了政府融资，印度的进出口银行（Exim Bank）更有可能在该地区开展项目。由于这一效应在中国在某些国家相较于印度获得了更多舆论支持，以及两国贷款方在出口结构上相似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本研究将此解释为印度与中国竞争的证据。相比之下，本研究没有发现中国通过共同设立项目来利用官方援助或信贷与印度竞争的证据。编译如下：

中国和印度——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仅在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就向 132 个发展中国家承诺了近 1550 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粗略观察表明，中国和印度可能正在利用它们的财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地缘战略和商业优势。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建设了一条从中国到中亚和欧洲的“带”——包括道路、铁路、港口和管道；以及一条“海上丝绸之路”，由印度洋沿岸的深水港口组成（Brewster 2015；Mullen & Poplin 2015）。印度是亚太地区少数几个正式反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国家之一（Pant 2017）。它也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双边援助。根据 Agrawal（2007 7）的说法，德里在“外交影响力、石油储备和商品市场”方面与北京竞争。新闻报道和案例研究还表明，印度对中国在其现有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的或感觉到的扩张性举措，十分敏感。在我们对德里决策者的采访中，印度进出口银行（Exim Bank）的一名官员表示，反制中国影响力是政府决定贷款和出口信贷审批时的考虑因素之一。然而，其他受访者声称，印度“根本没有与中国进行对标”，这种说法是“媒体虚构”。

现有文献几乎没有探讨是否以及如何使用援助和信贷作为战略竞争工具的问题。我们试图通过进行严格的分析，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探讨印度和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发展融资工具在全球范围内相互竞争。我们首先探讨印度政府是否会在回应中国政府融资的情况下，向发展中国家及其下属地区分配援助和信贷。具体来说，我们假设，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新融资承诺，那么印度政府更有可能向同一受援国（假设 1）或同一子国家地区（假设 2）提供资助。接着，我们评估印度的行为是否与其寻求与中国竞争的假设一致。

那些声称德里和北京使用官方金融工具相互竞争的人，很少提出可验证的关于政府动机的假设。我们遵循 Steinwand（2015 年，451 页）的定义，将“竞争”定义为“通过提供政府融资，反制其他捐助者所获得的影响力”。因此，如果印度政府在中国政府融资的新项目影响下，增加其在同一国家或子国家地区的财政投入，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印度试图与中国竞争的证据。通过在这些地区增加存在感，德里可能能够在相对层面上限制或甚至削弱北京的影响力——无论

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涉及地区政府或地方企业的子国家层面。然而，为了更直接地检验德里是否寻求反制中国实际获得的影响力增长，我们利用公共舆论数据，分析德里是否对那些近期舆论上偏向中国、对印度不利的地区赋予特别优先权。我们还区分了出于商业目的（例如争取出口市场）与出于地缘政治目的（例如加强与地区伙伴国的关系）的竞争。

现有关于发展融资竞争使用的研究集中在传统发展融资提供者之间的竞争（Davies & Klasen 2019；Fuchs、Öhler & Nunnenkamp 2015；Mascarenhas & Sandler 2006）以及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Bueno de Mesquita & Smith 2016；Hernandez 2017；Humphrey & Michaelowa 2019；Zeit 2021）。然而，据我们所知，关于涵盖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大国竞争的严格研究尚不存在。其一原因是缺乏全面可靠的数据。为了更好地了解印度和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在中国使用官方金融工具相互竞争，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数据集，包含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印度政府资助的 1196 个项目，这些项目分布在 93 个国家的 4308 个地区。总体而言，这些项目的货币价值为 145.8 亿美元（以 2014 年常数值计算）。该数据集捕获了印度两个最重要发展融资来源——外交部（MEA）和印度进出口银行（Exim Bank）——的官方发展援助、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出口信贷以及其他国家支持的金融流动。我们将这些数据与 Bluhm 等人（2020）的地理编码中国官方融资数据相结合，涵盖了 138 个国家的 3485 个项目，分布在 6184 个子国家地区。

然后，我们将印度项目的时间和地点与中国融资的项目进行比较。具体来说，我们对来自 123 个国家的 2333 个省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对印度官方融资分配的影响，使用带有省-国家-年份固定效应的线性概率模型。我们的结果表明，如果中国政府在前一年在某个子国家地区提供了融资，印度的进出口银行更可能向该地区分配信贷资助项目。我们还观察到在国家层面效应较弱。相比之下，印度外交部提供的发展援助在平均受援国中并不跟随中国的发展活动。我们发现，外交部在中国项目较为重要的地缘战略竞争领域——即印度的邻国——中，显著增加了发展援助。由于我们主要的发现对于印度的进出口银行更为稳健，而进出口银行主要关注商业目标，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印度主要是在进行商业而非地缘政治竞争。

我们的主要分析集中在中国政府资金的分配是否影响印度政府的援助和信贷分配决策，而非反向关系。印度更可能是跟随者，因为北京管理着一个显然更大的海外发展项目组合（Asmus、Fuchs & Müller 2020）。然而，我们也测试了中国是否与印度竞争，其结果符合预期，即我们并未发现印度的项目会吸引中国在同一地区展开项目。

一个主要的实证挑战是如何区分竞争与其他可能导致印度和中国政府融资之间正相关的因素。这些替代理论的主要解释包括选择性和模仿（Davies 和

Klasen 2019)。选择性指的是中国和印度可能遵循相似的金融分配标准。例如，两个国家可能倾向于支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政策和制度较高质量的地区。模仿指的是外国捐助者和贷款人——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信息获取不完全——可能会借鉴更有地方经验和默会知识的同行。

我们通过若干测试来区分竞争、选择性和模仿。首先，我们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文献中识别出的各种分配决定因素（直接或间接通过固定效应），从而部分考虑了选择性。其次，我们进行了行业回归，测试是否存在“行业内挤出”现象。当中国在某一子国家地区为特定行业提供援助或信贷时，我们没有发现印度在随后的年份里更有可能批准该地区 and 行业的援助或信贷。这一发现与模仿的替代理论不符。第三，为了测试印度是否出于争取更大影响力的动机，我们利用了盖洛普世界调查的数据。我们发现，印度的进出口银行在印度相对中国更受欢迎的地区更有可能增加其财务投入。这一模式很难与其他任何解释相吻合，除了与中国竞争的解释。由于在那些两个贷款人具有类似出口结构的国家中，挤出效应也更加显著，因此，看来这两个新兴经济体在商业影响力方面展开了竞争。因此，证据的总和表明，印度正在与中国竞争，而不仅仅是模仿它或遵循类似的分配标准。

本文在几个方面为文献做出了贡献。首先，它是首个在定量分析中分析中印竞争的研究。其次，据我们所知，我们提供了首个使用地理编码发展融资数据的本地竞争研究，涉及两个双边捐助者。第三，通过在分析中纳入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我们的研究为南南官方融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较小的证据库做出了贡献，除了官方发展援助（Bunte 2019；Horn、Reinhart & Trebesch 2021；Kaya、Kilby & Kay 2021；Werker、Ahmed & Cohen 2009）。较少优惠且更具商业导向的项目，占据了南方发展融资提供者每年向其同行承诺的官方融资的大部分，但它们在实证文献中往往被忽视。

新数据集：印度项目级别的开发融资

我们与威廉玛丽学院的 AidData 研究实验室合作，收集了两个主要印度机构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融资的项目级信息：外交部（MEA）和进出口银行（Exim Bank）（数据收集过程的详细信息见附录 C）。数据收集的第一步是从官方政府文件中检索项目级信息。最终的数据库包含了 2007 年至 2014 年间，印度在 93 个国家中的 1196 个项目。总体来说，这些项目的货币价值为 145.8 亿美元（以 2014 年常数值计算），其中进出口银行承诺了 95.6 亿美元，外交部承诺了 50.2 亿美元。第二步，我们根据 OECD-DAC 的定义，将所有项目分配到（子）部门，从“教育”到“人道援助”不等。

第三步，我们对这些项目进行了地理编码。我们将这 1196 个项目定位于 4308 个不同行政级别的项目干预点。我们的数据集考虑了印度项目的地理精度和覆盖的不同层级。如图 1 所示，我们为尼泊尔案例创建了跟踪基础设施项目

（如道路和铁路）预期路线的线性特征，以识别受基础设施项目影响的所有地区。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提取了所有第一行政区，这些区域被线性特征穿过。对于 599 个项目来说，空间精度足以将 2166 个项目位置分配到它们相应的省级单位。图 2 展示了这些项目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

图 1. 尼泊尔的印度和中国发展项目的地理编码（2000/07–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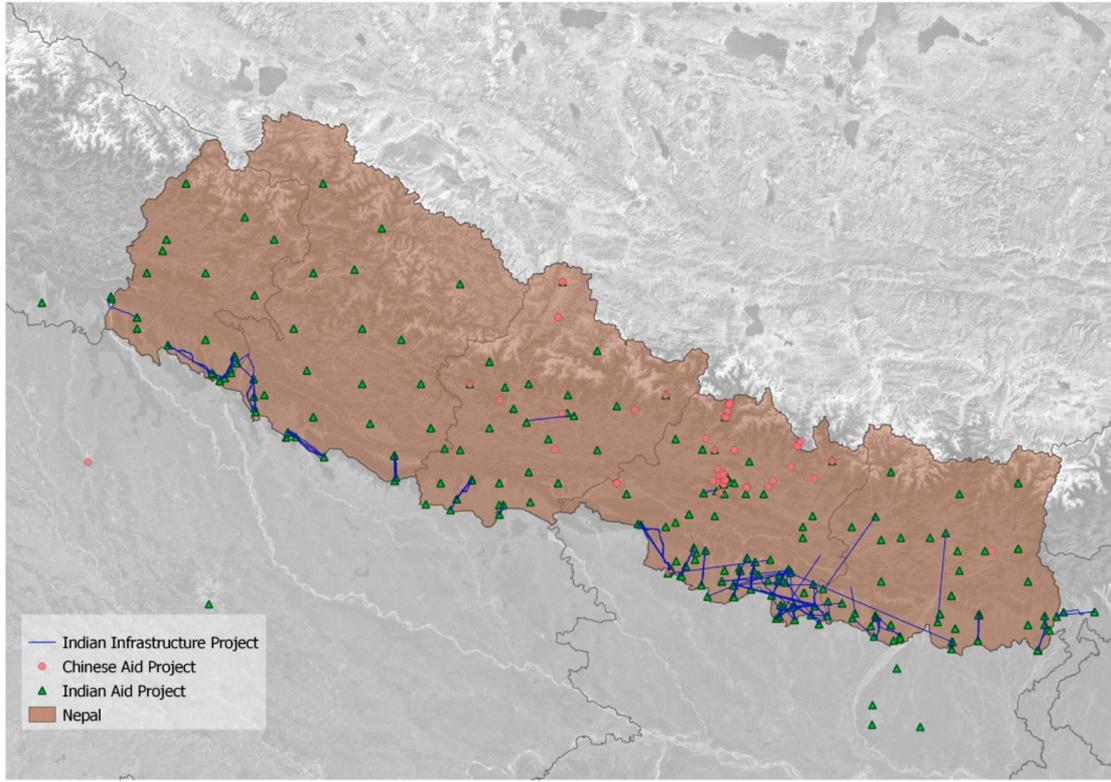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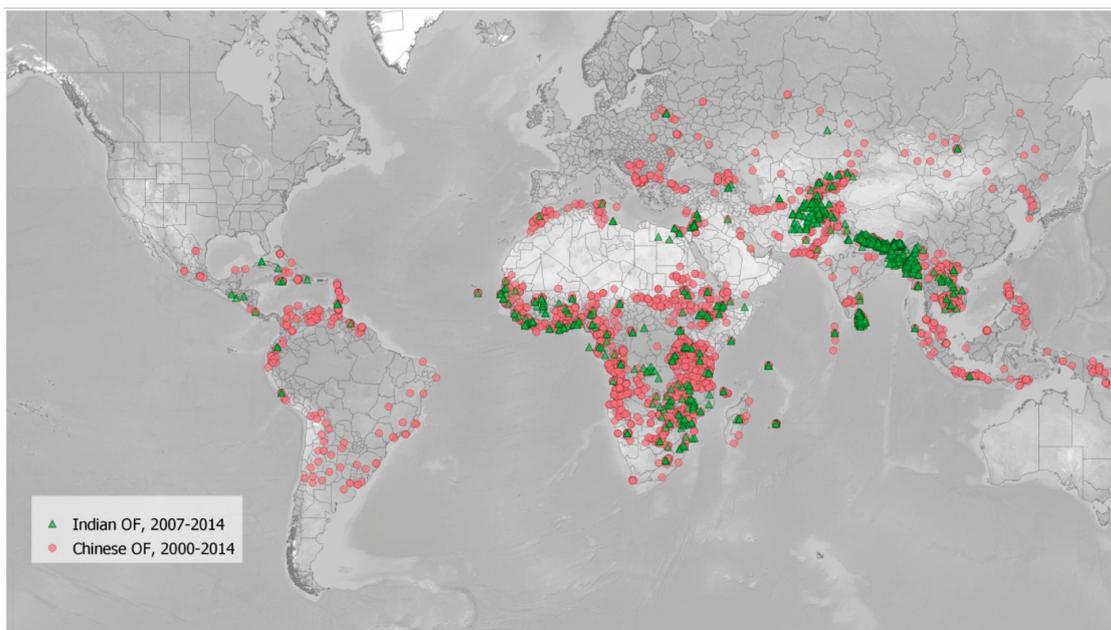


图 2. 世界地图：印度和中国政府资助项目的位置（2000/07 - 2014 年）。



将项目级数据汇总到世界地区层面，我们观察到印度优先考虑非洲和亚洲。接收最多项目的非洲国家包括利比里亚、加纳、马拉维、毛里求斯和莫桑比克。

尼泊尔、阿富汗、缅甸、不丹和斯里兰卡位居印度亚洲受援国名单的前列。我们还观察到外交部发起的项目比进出口银行更多，而进出口银行则承诺了较大的官方融资。在财务价值方面，印度在数据集中 64% 的融资承诺来自进出口银行，而 36% 来自外交部。相比之下，外交部在项目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约占 88%，并且出现在几乎是进出口银行的三倍的子国家地区。

这个新数据集使我们能够验证我们在附录 B 中更详细解释的预期，即外交部援助主要受地缘政治利益驱动，进出口银行贷款主要关注商业利益，是否在数据中得以体现。图 3 显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标准差变化对印度官方融资的货币金额（OOF 和 ODA）的影响结果。如预期所示，商业变量在 OOF 回归中显著，而在 ODA 回归中则不显著。具体来说，较大的进出口银行资金（OOF）更倾向于提供给印度出口更多的国家，这与该机构的任务一致。此外，对负债较重的国家提供的贷款数额较少，这可能是出于对这些国家偿债能力的顾虑。相比之下，外交部的援助分配（ODA）反映了其地缘政治利益。更准确地说，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一致性与外交部援助显著相关。外交部援助也更倾向于定向向印度邻国，这些国家对印度的战略利益更大。两个政治变量——联合国投票和地理距离——未能成为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显著预测变量。根据这些结果和我们的理论考虑（附录 B），我们将把印度外交部对中国官方融资活动的回应解读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证据。相反，我们将把印度通过进出口银行对中国官方融资活动的回应解读为商业竞争的证据。

本文原题为 "Does India Use Development Finance to Compete With China? A Subnational Analysis"。作者为 Gerda Asmus, Vera Z. Eichenauer, Andreas Fuchs 和 Bradley Parks。Gerda Asmus 是霍恩海姆大学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哥廷根大学经济学系的高级研究员，拥有海德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Vera Z. Eichenauer 是德国联邦财政部的应用经济学家，曾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瑞士经济研究所 KOF 担任研究员。Andreas Fuchs 是哥廷根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伊比利亚美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及基尔中国事务计划的主任。Bradley Parks 是威廉与玛丽学院 AidData 的执行主任以及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教授，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学位。本文于 2024 年 2 月刊于 KIEL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元区经济疲软的结构性因素

Alan Wm. Wolff/文 廖世伟/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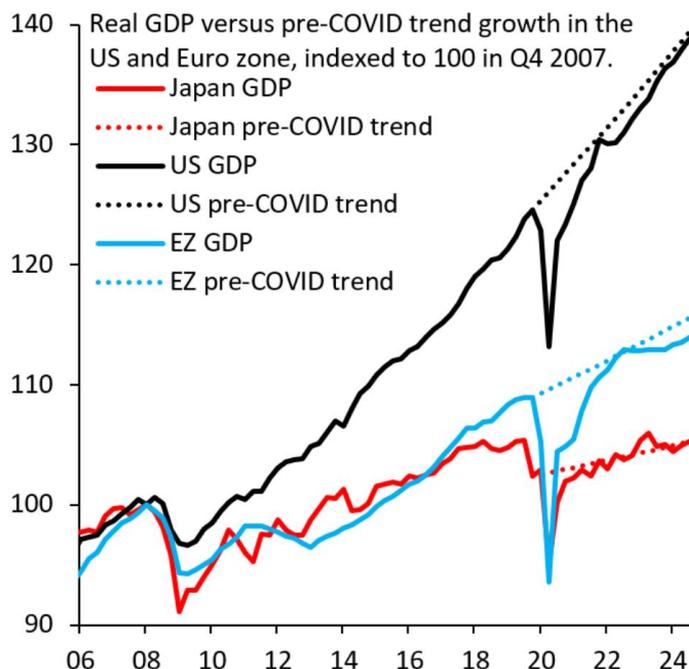
导读：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增长模式的困境，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无法获得廉价俄罗斯能源带来的严重影响。然而，欧洲在后 COVID 复苏中落后于美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财政联盟和债务积压，导致反周期刺激不足，这也是欧洲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落后于美国的原因。若没有财政协调和必要的改革，欧元区可能面临“日本化”风险，即在低增长下依赖央行收益率上限维持高债务水平。编译如下：

市场目前关注的焦点是欧洲的增长模式，而这一模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受到了严重冲击。虽然失去廉价的俄罗斯能源对经济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使得欧洲在后疫情时代相较于美国的复苏显得更加滞后。缺乏财政联盟和债务积压意味着在每一次不利冲击后，反周期刺激都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何欧洲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复苏进程落后于美国的原因之一。财政联盟将需要在债务和转移支付方面做出艰难的妥协，而如果没有这种妥协，欧元区极有可能走向“日本化”，即在低增长的情况下，高债务只有通过中央银行的收益率上限政策才能得以维持。

欧洲疲软的结构性驱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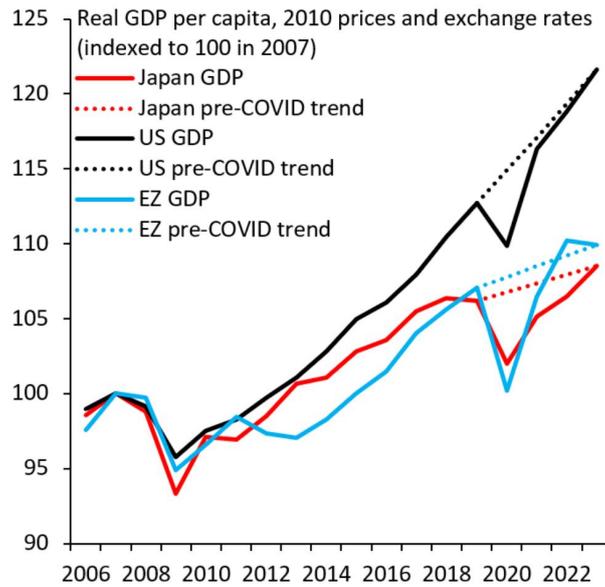
欧元区经济相对于美国表现不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接下来的十年的低迷奠定了基础，欧元区的 GDP 无论是按绝对数值（图 1）还是人均计算（图 2）都逐渐落后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总量增长与人均增长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美国的超越常常被归因于移民速度的提升。然而，这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即使按人均计算，美国的增长优势仍然显著。

图 1：美国与欧元区的实际 GDP 对比，按 2007 年第四季度为 100 进行指数化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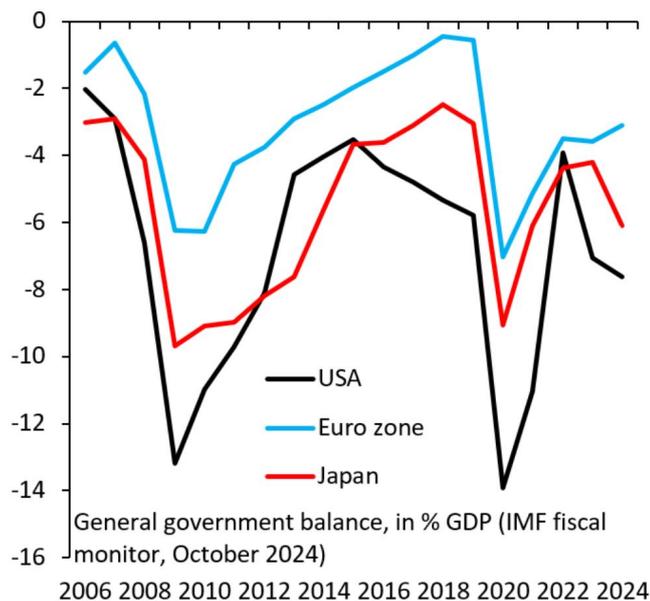
图 2：按 2010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实际人均 GDP，按 2007 年为 100 进行指数化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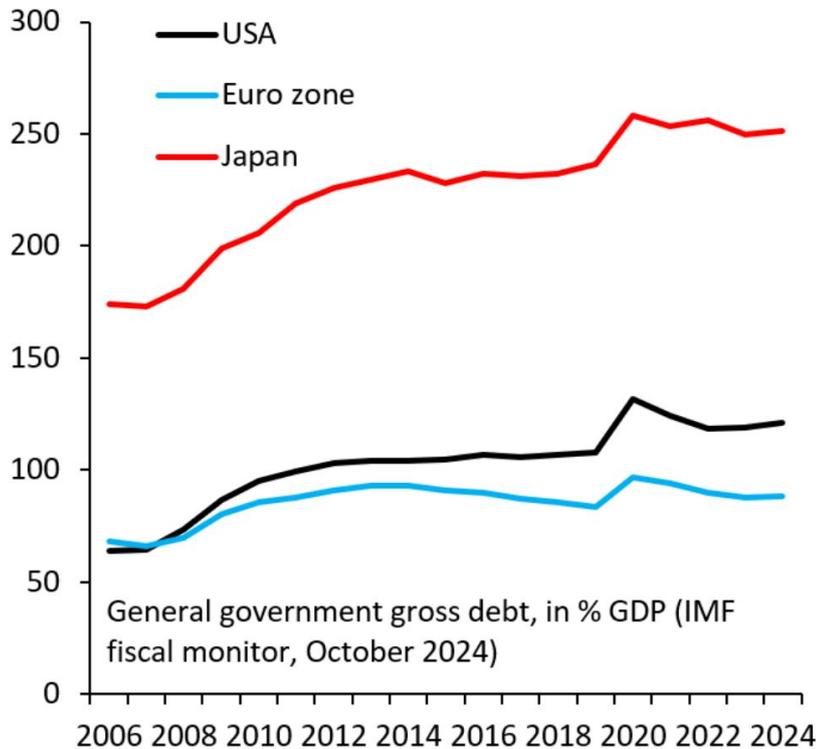
实际上，缺乏财政联盟才是欧元区低迷表现的真正结构性原因。加上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日益加重的法国债务负担，每次经济冲击后，欧元区的刺激措施总是显得不够充足，因为货币联盟往往陷入关于如何支付刺激措施的争论。图 3 显示了这在 2008 年危机和新冠肺炎冲击中的表现。在这两种情况下，欧元区总体政府赤字的扩大幅度都低于其他地区（图 3），而债务的增加幅度也较小（图 4）。当然，在新冠肺炎肆虐期间联合发行欧盟债券标志着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那次联合发行是一次性的，而且极具争议性。其结果是，由于反周期刺激措施始终不足，永久性的经济疤痕和磁滞效应将继续出现在原本应该是周期性波动的经济活动中。

图 3：图政府总余额，占 GDP 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图 4：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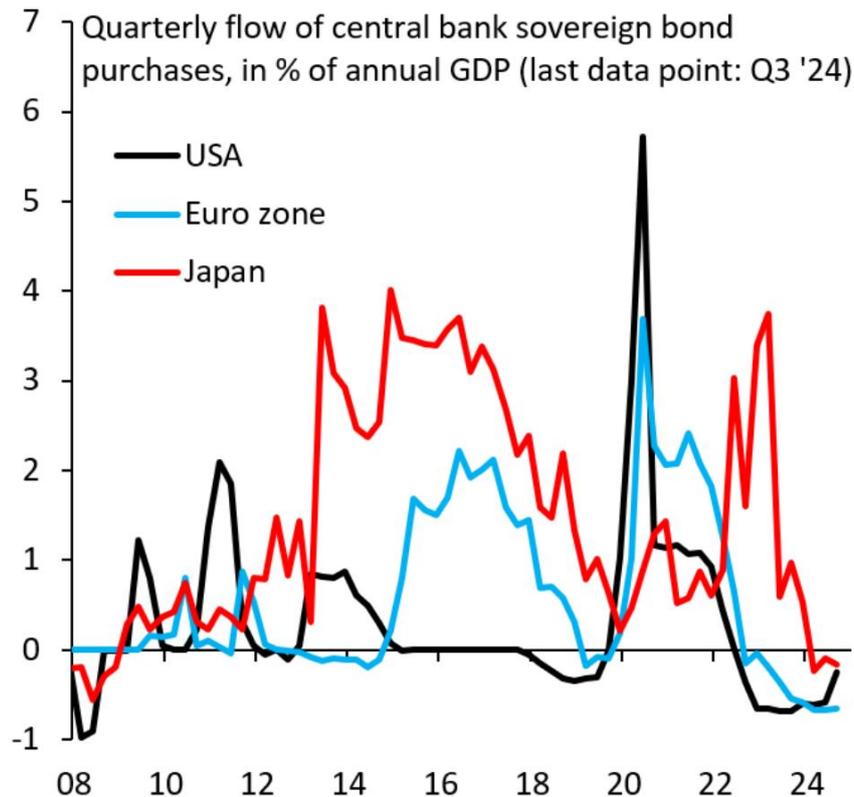
要实现财政联盟，欧元区南北各国需要进行艰难的妥协。一个公平的财政联盟意味着各国应该以相似的政府债务水平加入。欧元区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荷兰和德国的债务水平分别为 40% 和 60%，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水平分别为 110%、140% 和 100%。正如我们最近的博客文章所指出的，高债务国家中存在大量私人财富，可以通过对这些财富征税来降低公共债务水平。这种税可以是累进的，即可以与家庭收入挂钩，并将向金融市场发出信号，表明减少债务现在是一个政策优先事项，这本身将有助于在严重冲击中保持市场准入，而不必依赖欧洲中央银行（ECB）的紧急债券购买。

当然，财富税的政治阻力很大。这种阻力反映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尤其是在欧洲央行准备在危机发生时通过收益率上限来维持市场稳定的情况下。2022 年中期，随着全球通胀上升，全球收益率上升，欧洲央行便采取了这种做法，并且此后推出了新的传导保护工具（TPI）。TPI 允许欧洲央行在没有事后条件的情况下对收益率进行上限控制，而不像德拉吉时期的“直接货币交易”（OMT）那样附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式的条件。可以说，财政联盟的前景与欧洲央行在主权债务市场中的角色是成反比的：欧洲央行虽然能防止债务危机，但也因此降低了必要改革的可能性。

走向日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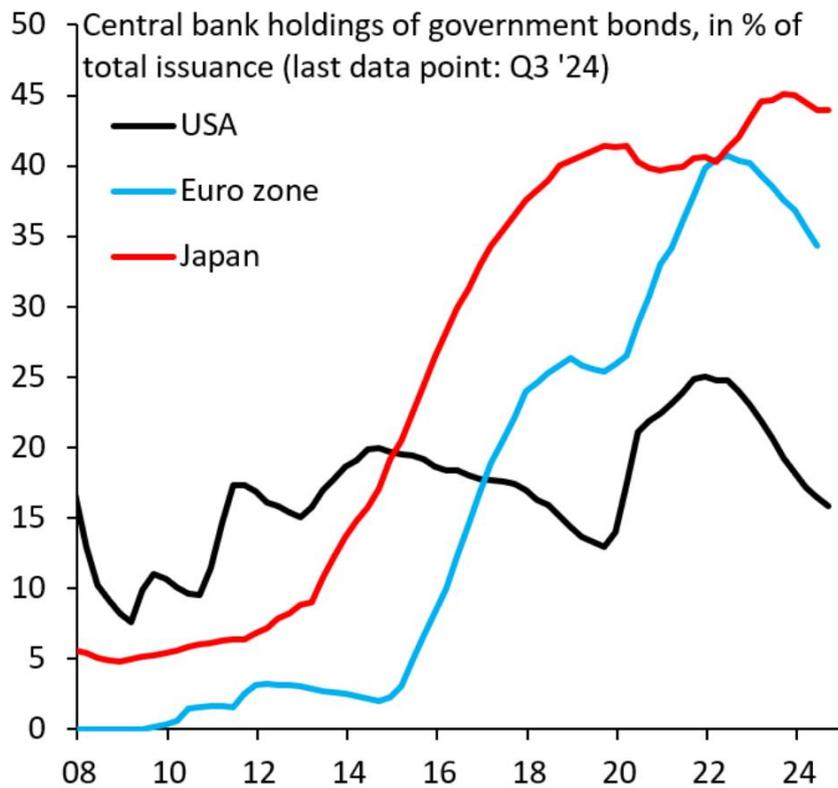
如果欧元区未能就债务和财政联盟达成一项重要妥协，欧元区将面临严重的“日本化”风险。这是一种低增长与高债务并存的经济均衡状态，其中只有依靠中央银行的收益率上限政策才能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事实上，欧洲央行在主权债券市场的购买行为与日本央行更加相似，而非美联储（图 5）。从累计购买量（按政府债务总额的比例）来看，欧洲央行的购买行为呈现出与日本央行类似的上升阶梯状（图 6），而美联储则更多呈现出周期性和稳定的模式。欧洲央行在债务市场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可能将欧元区锁定在长期的低增长均衡状态中，这正是日本经济长期面临的困境。

图 5：中央银行季度主权债券购买流量（占年度 GDP 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图 6：中央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比例（占总发行量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Haver Analytics。

本文原题为 “Expect Trump's demands, not rules, to govern US trade policy”。本文作者 Alan Wm. Wolff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军事实力确保金融主导地位

Pierre Yared /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美国在军事和金融两大领域都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本文通过博弈论模型展示了全球美元的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称之为“过度特权”——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密不可分的。美国的双重霸权使其能够以极低的利率为国防开支融资，同时巩固其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并支持其海外盟友。然而，这种特权并非必然或永恒，它脆弱地依赖于全球力量动态的稳定。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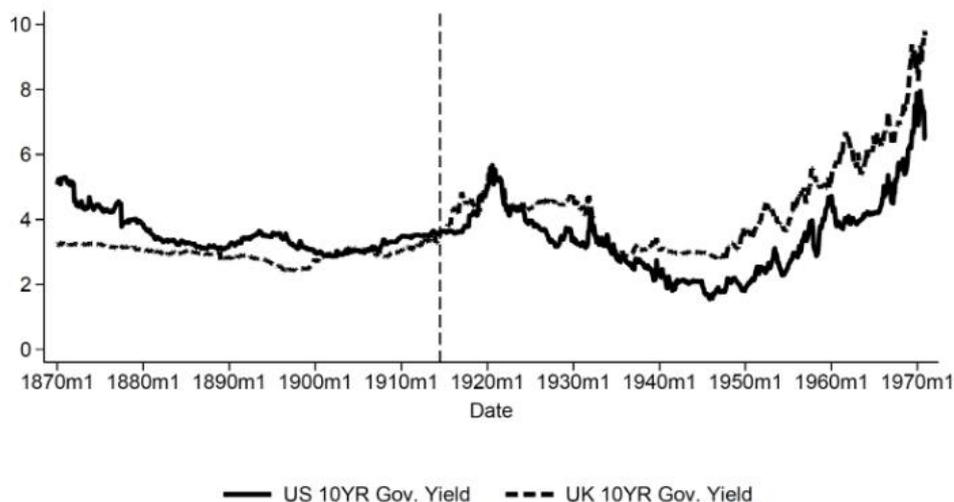
美国在军事和金融两大领域都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本文通过博弈论模型展示了全球美元的主导地位——经济学家称之为“过度特权”——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是如何密不可分的。这是美国的双重霸权使其能够以极低的利率为国防开支融资，同时巩固其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并支持其海外盟友。然而，这种特权并非必然或永恒，它脆弱地依赖于全球力量动态的稳定。

如今，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既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又拥有以优惠利率借贷的金融优势。但这种主导地位并非天生注定，而是历史过渡的结果，在这些过渡中，军事力量不断重塑全球金融秩序。

以图 1 为例，它捕捉到了地缘政治剧变期间利差的巨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强国，债券收益率翻转，倾向于美国（Eichengreen et al.2012）。类似的动态早期就已发生，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崛起，取代荷兰的霸主地位。这些反转凸显了一个明确的模式：金融主导地位跟随军事力量，尤其是在全球不稳定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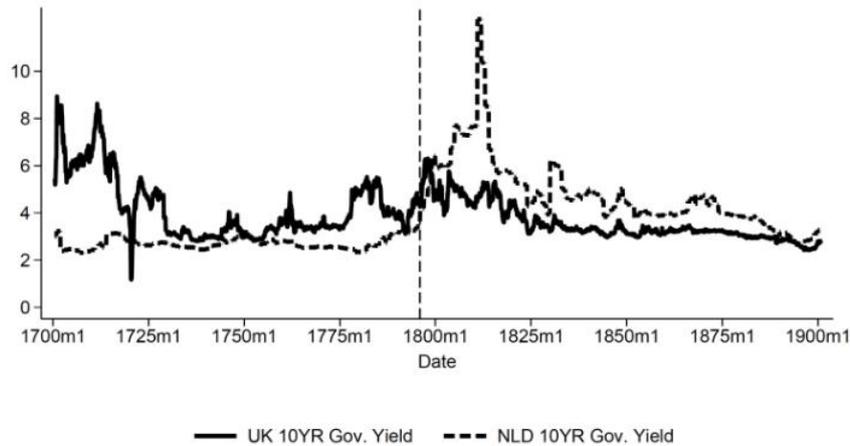
图 1 军事主导地位变化与历史中的债券收益率

A)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英债券收益率对比



B) UK/NETHERLANDS BOND YIELDS AROUND NAPOLEONIC W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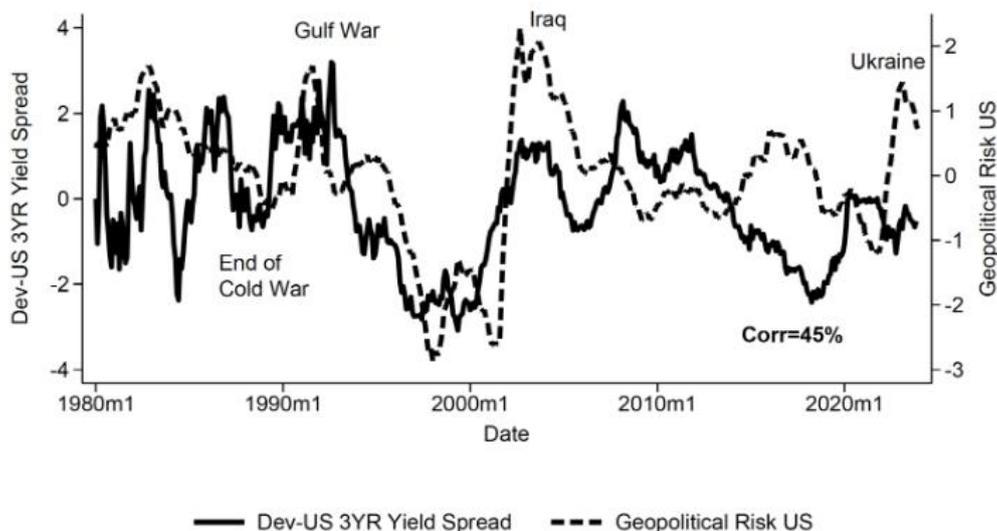
B) 拿破仑战争时期英荷债券收益率对比



注：图 1a 绘制了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数据从 1870 年 1 月到 1970 年 12 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垂直线标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14 年 7 月）。图 1b 绘制了英国和荷兰的 10 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数据从 1700 年（英国的收益率数据开始出现）到 1900 年。垂直线表示 1795 年荷兰被拿破仑入侵。美国和英国债券收益率来自全球金融数据。荷兰债券收益率来自 Korevaar, Francke 和 Eichholtz（2020）。荷兰 18 世纪的产量使用了荷兰省的数据。

那么，是什么让主导货币与众不同呢？传统智慧将其归功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强大的贸易网络（例如，Eichengreen 2011, Rey et al. 2014）。虽然这些因素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它们无法解释军事实力和金融特权之间惊人的一致性。图 2 说明了这一点，显示了地缘政治危机如何不断增强美国的借贷优势。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美国债券收益率下降，因为投资者纷纷涌向一个军事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发行的安全资产。结论很清楚：军事力量不仅仅是一个支持因素；它是金融霸权的基石。

图 2：发达国家与美国借款成本对比与地缘政治风险



注：该图绘制了六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的三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差异与美国历史性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之间的关系（年化百分比）。数据来源于 Caldara 和 Iacoviello（2022）。收益率差异通过减去 10 年的移动平均来去除随机趋势，所有收益率数据来源于全球金融数据。2021 年后德国的三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延伸自彭博数据。我们通过对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取对数并进行 12 个月的移动平均来减少异常值的影响。样本为每月数据，涵盖 1980 年 1 月到 2023 年 11 月。

事实上，美国等战胜国在一战和二战后保持了较低的通胀和较强的金融稳定性，而战败国则面临着通胀飙升和严重的债务贬值。因此，军事优势让投资者放心，一个国家不会遭受失败的经济混乱，巩固了对其相对信誉的信心。

在我们的工作论文（Pflueger 和 Yared 2024）中，Carolyn Pflueger 和我提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军事和金融优势之间的自我强化循环。军事实力增强了投资者对一个国家偿还债务能力的信心，尤其是在危机时期。相反，金融主导地位使霸权国家能够以较低的借贷成本为其军事提供资金，从而巩固其全球地位。

然而，这个系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的模型凸显了其脆弱性：一个拥有深厚金融市场的竞争对手可能会颠覆这一周期，引发霸权的快速转型。例如，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对美元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直接挑战。全球接受的中国货币可以吸引国际资本，削弱美国的金融特权及其维持军事优势的能力。

从我们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些关键结论如下：

1. 审慎的债务管理支持军事主导。目前，美国以低利率利用全球金融市场的能力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政治优势。然而，信誉的丧失——无论是来自高额的继承债务还是反复的债务上限僵局——都有可能威胁到美国的金融和军事地位。

2. 赤字支出是战略性的。相反，借款资助军事支出不仅仅是财政负担，它实际上增强了美国的金融特权。通过巩固其地缘政治主导地位，这类支出可以保障相对较低的长期借款成本。

3. 大规模削减军事预算是灾难性的。减少军事资金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而且在金融上也会带来严重后果。一个更弱的军事力量将削弱美国的借款特权，使所有公共支出变得更加昂贵，并引发利率上升和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恶性循环。

4. 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安全风险。如果中国成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将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重大威胁。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会加速权力的急剧转移。

总之，军事和金融主导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它关乎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生死存亡，而美国正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美国的“过度特权”不仅仅是一项经济福利——它是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石。然而，不断增加的债

务和不受限制的福利支出威胁着这一微妙的平衡。随着美国面对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优先考虑财政纪律和军事实力不仅是明智的选择，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美国霸权的自我强化循环可能会瓦解，给国家安全和全球稳定带来可怕的后果。

本文原题为“US military strength secures financial dominance”。本文作者 Pierre Yared 是哥伦比亚商学院 MUTB 国际商务教授、教师事务高级副院长和高管教育副院长。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VOX。[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没有免费的贸易税：特朗普承诺的关税将影响大量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汽车和化学品的贸易流通

Julieta Contreras, Mary E. Lovely, Jing Yan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特朗普关税政策计划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关税，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关税将推高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玩具等领域的进口商品价格，同时增加美国制造商的生产成本。若扩大自由贸易伙伴，还可能影响化工产品和燃料等重要领域。关税政策可能引发贸易报复，增加消费者负担，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同时削弱市场竞争力，对整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编译如下：

如果当选总统特朗普实施预期中的美国进口关税增加，美国消费者将很快面临来自外国商品的更高价格。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10% 到 20% 的关税，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预计价格涨幅最大的商品是那些目前关税较低且主要来自中国的商品。

分析当前的贸易流和关税率表明，如果特朗普政府实施其承诺的关税增加，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及电气机械将面临最大的进口税负。这两个行业占美国总进口的较大份额，目前面临低关税率，且主要来自中国。这些行业的进口商品包括资本货物、生产中间投入品和最终商品，这将导致美国供应链和制造商成本的提高和生产中断。

如果对所有美国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包括中国，机械、电子、交通设备和化学品等大量商品也将面临新税，这些税负大部分会落在美国企业身上。然而，消费者也将面临进口最终商品成本的上升，包括电气设备、玩具和运动用品、蔬菜和肉类产品以及进口食品。

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实施更高关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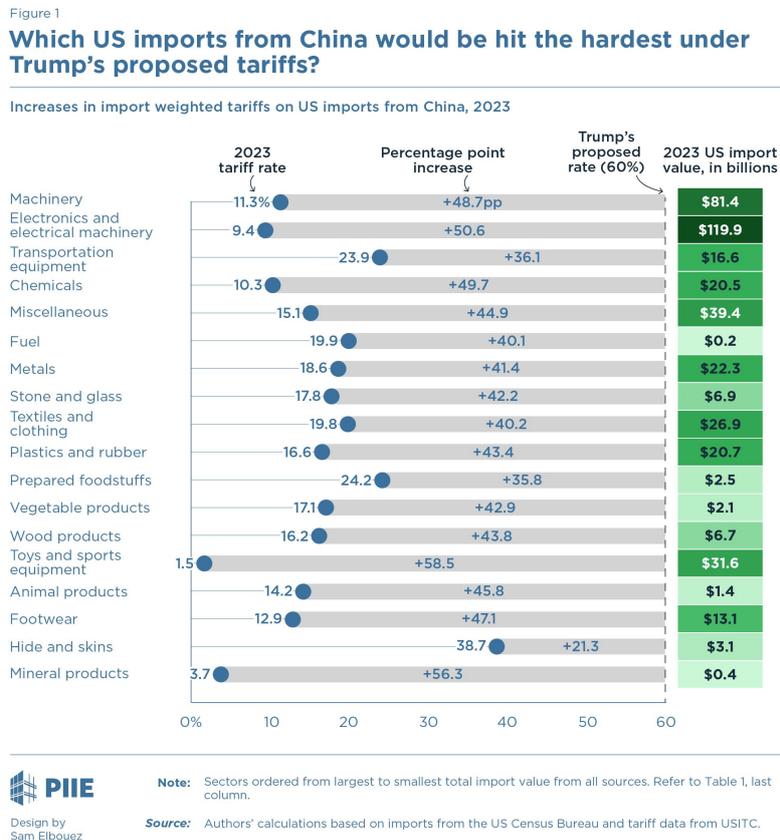
鉴于国内普遍认同需要减少美国对于中国的依赖，并且特朗普可通过 2018 年关于强迫技术转让的调查获得征收关税的授权，我们预计特朗普当选后将迅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在竞选中，他提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

如表 1 所示，中国是美国玩具和运动器材的主要供应国，提供 40% 的美国鞋类进口，并且约四分之一的美国电子产品和纺织服装进口来源于中国。中国还向美国出口 18.3% 的机械和机械设备。2023 年，来自中国的电子产品和电气机械成为美国进口价值最大的商品，总额达 1199 亿美元。该行业内，中国是许多单个产品的主要供应国。

对中国征收 60% 的关税将对国际商品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经过 2018-2019 年的中美贸易战，62% 的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目前面临平均 16% 的关税，远高于大多数最惠国关税，但远低于特朗普在竞选中承诺的关税。一些产品的关税仍然很低，如图 1 所示，目前只有玩具和运动器材、矿产以及电子和电气机械三类进口商品面临低于 10% 的平均关税。由于美国依赖中国的生产，许多电子

产品，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表，几乎没有受到贸易战关税的影响。如果对这些设备征收 60% 的关税，必将导致这些设备以及视频游戏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消费者价格上涨。

图 1 在特朗普提议的关税下，美国哪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美国消费者还将感受到对日常购买的玩具和运动器材、鞋类及纺织服装征税的影响。在这些行业中，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最大的是玩具和运动器材。尽管玩具看似容易找到替代供应商，但中国在生产玩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部分原因是其能生产符合美国产品安全标准的材料。玩具和运动器材的当前关税很低，如图 1 所示，对这些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几乎肯定会直接影响美国家庭。

美国企业也将感受到对中国征收更高关税的痛苦。美国企业是上述电子产品和电气机械的最终用户。然而，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主要集中在资本设备和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商品上，对机械和机械设备的进口征税将显著提高美国制造商的成本。2023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总额为 814 亿美元（仅次于电子产品），如果特朗普实施承诺的“60%一刀切”进口税率，将面临 49 个百分点的关税增加。

对除中国和自由贸易协议伙伴以外的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

2023 年，美国 13.6% 的商品进口来自中国，38.3% 来自自由贸易协议（FTA）伙伴，其余 48% 的进口商品来自其他来源，目前这些商品按最惠国（MFN）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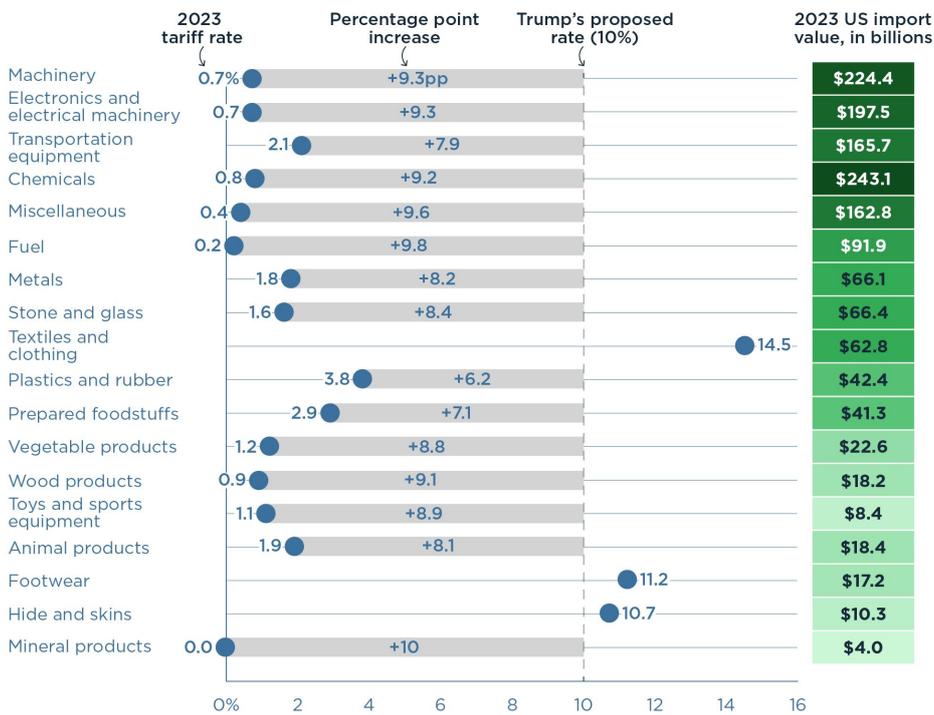
率征税。如图 2 所示，即便是 10% 的关税，也会显著提高这些商品的税率。只有三类进口商品——纺织服装、鞋类和皮革——目前按 MFN 税率征税超过 10%。然而，来自非 FTA 伙伴的这些商品的关税低于目前对来自中国的类似商品征收的税率。

图 2 哪些来自非中国和非自由贸易协定（FTA）伙伴的美国进口商品将受到特朗普提议的关税最严重的影响？

Figure 2

Which US imports from partners except China and FTA partners would be hit the hardest under Trump's proposed tariffs?

Increases in import weighted MFN tariffs on all US imports excluding from China and FTA partners, 2023



Design by
Sam Elbouez

FTA = Free trade agreement. MFN = Most favored nation.

Note: Sectors ordered from largest to smallest total import value from all sources. Refer to Table 1, last column.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imports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and tariff data from USITC.

与非 FTA 伙伴的贸易包括与欧盟、英国和日本的大规模双向贸易。这些购买集中在化学品、机械、电子及电气机械、运输设备和其他制造业（包括精密仪器）五大类产品。如果特朗普对所有美国进口伙伴实施 10% 的关税，这些类别将面临 7.9 到 9.6 个百分点的税率增加。美国进口的大部分这些产品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即使他们转向国内或其他外国产品，也将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

对 FTA 伙伴征收更高关税

美国几乎 40% 的进口商品来自 FTA 伙伴。当前，这些伙伴的关税税率接近零，只有纺织服装和皮革类产品的关税税率超过 1%。因此，如果特朗普继续实施对 FTA 伙伴的 10% 进口税率，几乎所有商品流将面临约 10 个百分点的关税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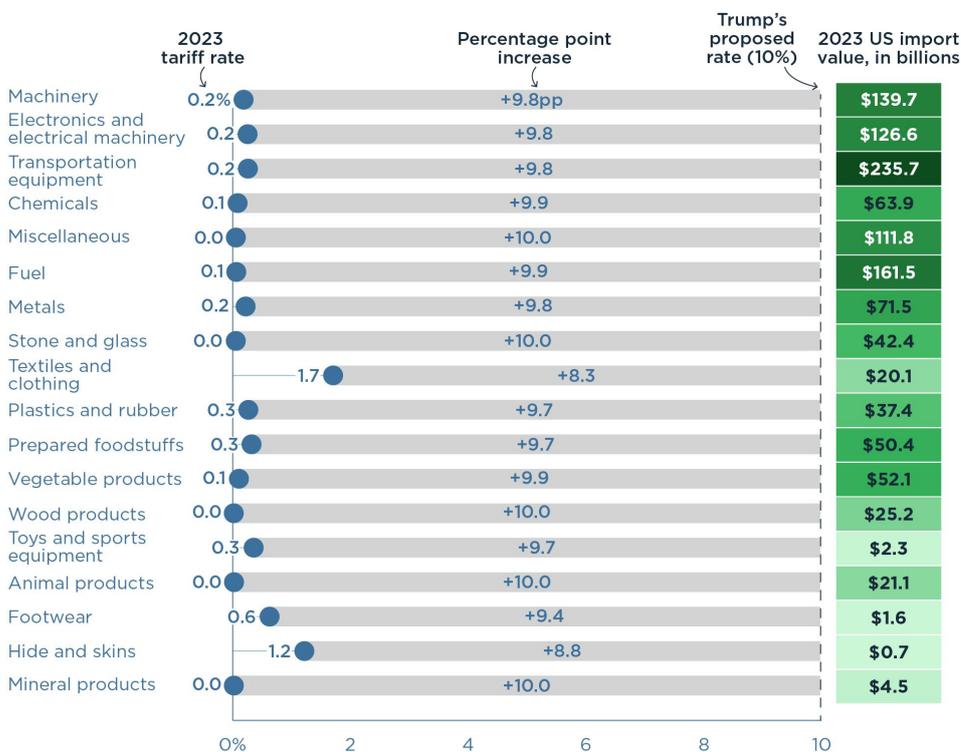
特别受到影响的行业将是运输设备，2023 年美国从这些伙伴进口的商品总额为 2357 亿美元。在北美，汽车和卡车的生产高度整合，某些车辆在完成前多次跨越美国边界。这些流通将如何征税尚不明确。韩国也是美国运输产品进口的重要供应国，并且已成为美国汽车行业的主要外国投资者。显然，对其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征收新关税将影响其在美国的生产经营。

图 3 在特朗普提议的关税下，哪些来自自由贸易协定（FTA）伙伴的美国进口商品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Figure 3

Which US imports from FTA partners would be hit the hardest under Trump's proposed tariffs?

Increases in average ad valorem equivalent tariffs on US imports from FTA partners, 2023



Design by
Sam Elbouez

FTA = Free trade agreement

Note: Sectors ordered from largest to smallest total import value from all sources. Refer to Table 1, last column. Ad valorem equivalent tariffs are calculated as the duty-to-import value ratio.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样会影响燃料产品、机械设备以及电子和电气设备。如表 1 所示，FTA 伙伴国供应了美国超过一半的燃料和运输设备进口，约三分之一的机械进口，以及四分之一的电子和电气设备进口。

美国的 FTA 伙伴国也是美国出口的重要买家，特别是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这些国家可能会对美国偏离 FTA 协议的提议作出反应，征收自己的关税，从而减少美国制造商、农民和牧场主进入其本国市场的机会。

美国公司依赖 FTA 伙伴进行政策确定的贸易——也就是说，他们期望关税保持在商定的低税率上。因此，美国与之签署 FTA 的国家一直被视为从中国转

移生产的潜在地点。关税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偏离协议税率的变动增加了这些决策的风险。

如果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高关税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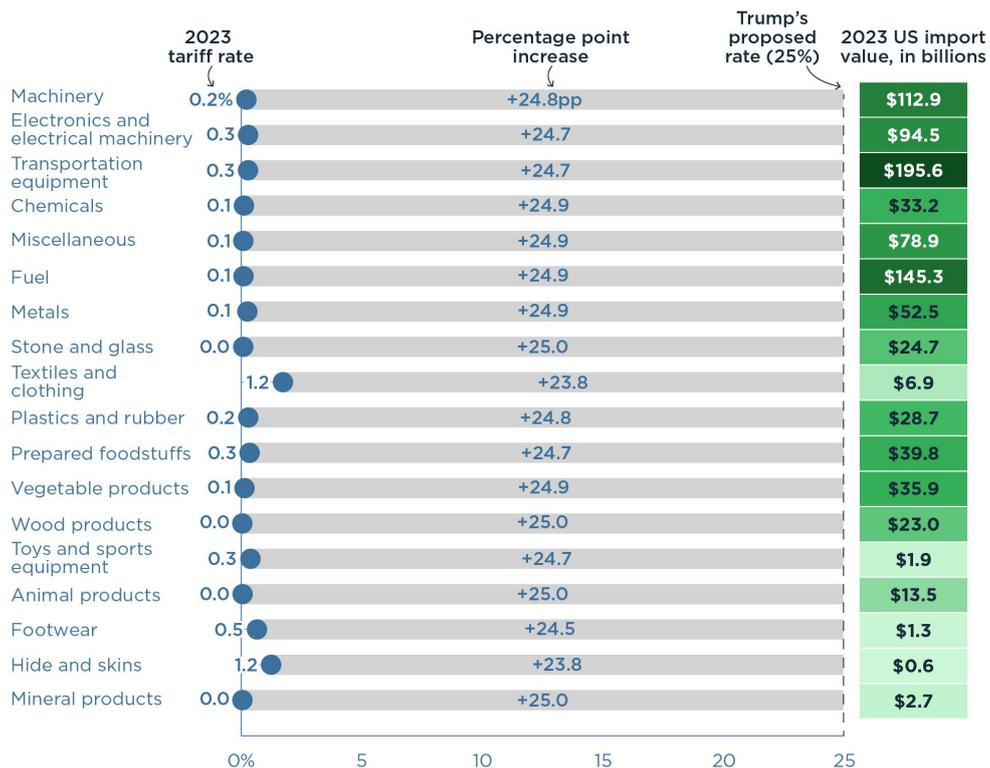
特朗普最近威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 25% 的关税，而这两个国家目前因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享受对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如果这些关税增加得以实施，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运输设备和机械产品的进口。如图 4 所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伙伴进口的电子产品、杂项制造业和可能的燃料产品也将面临关税增加。目前，来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伙伴的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不到 1%。

图 4 在特朗普提议的关税下，哪些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美国进口商品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Figure 4

Which US imports from Mexico and Canada would be hit the hardest under Trump's proposed tariffs?

Increases in average ad valorem equivalent tariffs on US imports from Canada and Mexico, 2023



Design by
Sam Elbouez

Note: Sectors ordered from largest to smallest total import value from all sources. Refer to Table 1, last column. Ad valorem equivalent tariffs are calculated as the duty-to-import value ratio.

Source: Authors' calculation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US Census Bureau.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伙伴也是美国重要的蔬菜产品（占总进口的 47%）、加工食品（42%）和动物产品（33%）的来源。因此，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更高的关税将推高美国食品价格。

已知的不确定因素

目前，我们对特朗普政府如何实施新关税知之甚少。基本政策设计尚未公布，包括最终征收的关税税率，是否分阶段实施，是否排除某些产品，以及自由贸易协议伙伴是否豁免。在中美贸易战期间，设立了一个豁免程序，允许公司为中国机械的进口申请关税豁免。这些豁免大多在拜登政府下到期。鉴于提议的关税普遍适用且税率较高，任何豁免程序都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制造商的大量申请。

由于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自由贸易协议承诺，预计贸易伙伴将做出报复。正如在中美贸易战中所经历的那样，报复可能不仅包括对美国出口的新关税，还可能包括其他限制性商业措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限制采取了反制措施，包括将外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对关键供应品实施出口管制。鉴于特朗普承诺利用关税作为与其他政策问题（如移民和毒品流动）谈判的杠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将影响美国贸易伙伴的反应，他们的决策将受到满足这些要求的成本以及他们对美国的商业和安全依赖的影响。

没有任何贸易税是免费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新关税将给美国带来高昂的成本。尽管最终对价格的影响将取决于进口需求和供应弹性，但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研究发现，关税几乎完全转嫁给进口商。这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将承担更高的关税成本，给普通美国家庭带来重大负担，低收入家庭负担更重。此外，保护主义势必抑制竞争，导致美国本土制造的商品和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即使没有预计的来自贸易伙伴的报复，更高的美国关税也会对美国公司和出口商造成不利影响。

本文原题为 "No trade tax is free: Trump's promised tariffs will hit large flows of electronics, machinery, autos, and chemicals"。作者为 Julieta Contreras, Mary E. Lovely 和 Jing Yan。Julieta Contreras 在蒙特雷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生院获得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 2021 年 12 月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Mary E. Lovely 在哈佛大学获得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彼得森研究所安东尼·M·所罗门高级研究员。Jing Yan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了管理学学士学位，并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SAIS) 的国际经济与金融和亚洲研究硕士学位，于 2023 年 9 月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限制进口墨西哥汽车将损害美国制造商

Julietta Contreras /文 申劭婧 / 编译

导读：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计划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征收极其高额的关税，除非墨西哥政府承诺控制移民和毒品越境。然而，由于当前汽车制造业的深度整合，这一举措将同样重创美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了避免双输，特朗普政府应该在正式决策前与美国产业界和墨西哥政府进行磋商。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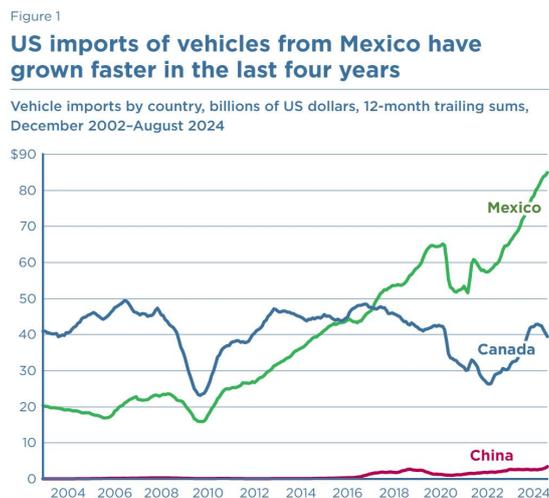
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之前做出了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承诺，宣称要对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和卡车征收 200-500% 的关税，最近，他再次威胁要向墨西哥的所有进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同时取消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与墨西哥谈判签订的贸易协定的条款。同时，他的贸易顾问也主要关注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汽车的投资和投入。

但征收高额关税不仅会提高美国汽车的价格，还会冲击墨西哥汽车行业及其工人，也会导致美国的就业机会减少。由于北美汽车行业的价值链高度整合，墨西哥汽车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使用了原产美国的零部件，而这些零部件的美国供应商可能很快就会陷入特朗普贸易战的交叉火力中。

墨西哥早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汽车出口国，这一趋势因特朗普 2018 年签署，执政最后一年生效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USMCA）贸易协定而得到加强。图 1 显示了过去四年中从墨西哥进口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增长速度。20 世纪 90 年代北美贸易协定的优惠待遇使得中国等一些国家可以从中获益，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USMCA 规定了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ROOs），以阻止第三国生产商通过向墨西哥出口零部件并组装成汽车运往美国而从中套利。而该协议更广泛的目标是使得汽车制造业和投资回流到美国。

USMCA 已经准备好了 2026 年的回顾总结，而特朗普的团队将重新谈判其条款，特别关注汽车行业，这意味着有利于美国工人的价值链正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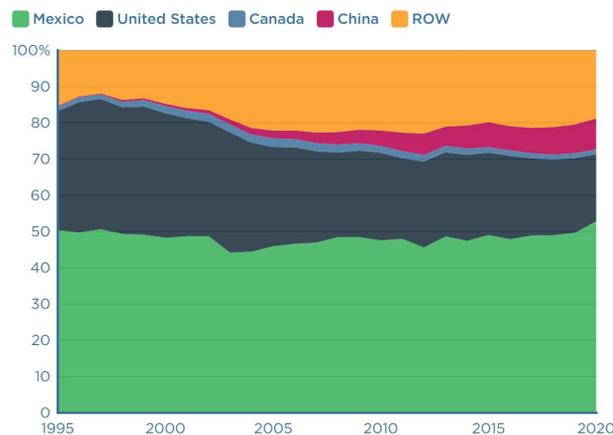
图 1 过去四年中，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增长变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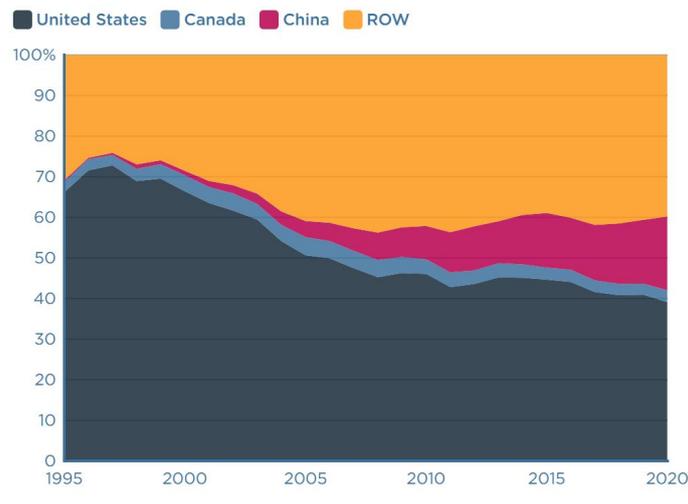
在他的竞选中，特朗普主张一种针对所有进口商品 10%或 20%的普遍关税，甚至建议对所有墨西哥进口商品征收 25%，而对墨西哥车辆征收 200%至 500%。11 月下旬，特朗普威胁要对所有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征收 25%的关税，除非墨西哥当局阻止移民和毒品越境。墨西哥将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因为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超过了其 2023 年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15%。按原产国划分的墨西哥汽车出口附加值构成显示，美国制造的投入与墨西哥汽车生产深度融合（图 2），占 2020 年墨西哥出口附加值总额的近 20%。中国附加值占这些出口附加值总额的 9%。同年，在墨西哥汽车出口的外国增加值中，美国几乎占 40%。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增加值份额有所增长，但在 2020 年仍仅占外国增加值的 18%。

图 2 美国仍然是墨西哥向所有目的地出口汽车的外国附加值的重要来源。

国内和国外增加值占出口总额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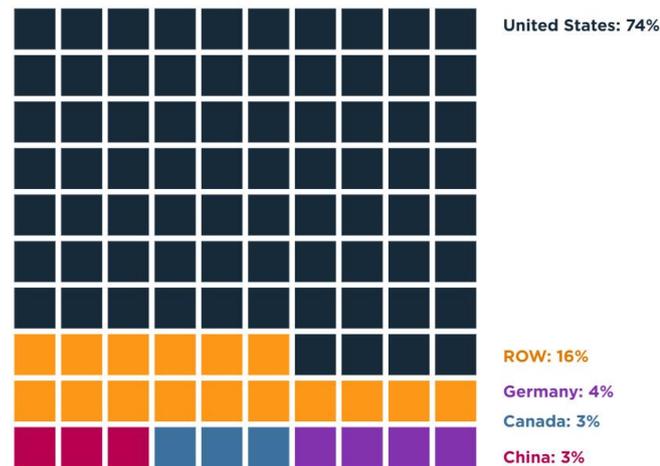
A. 作为外国增加值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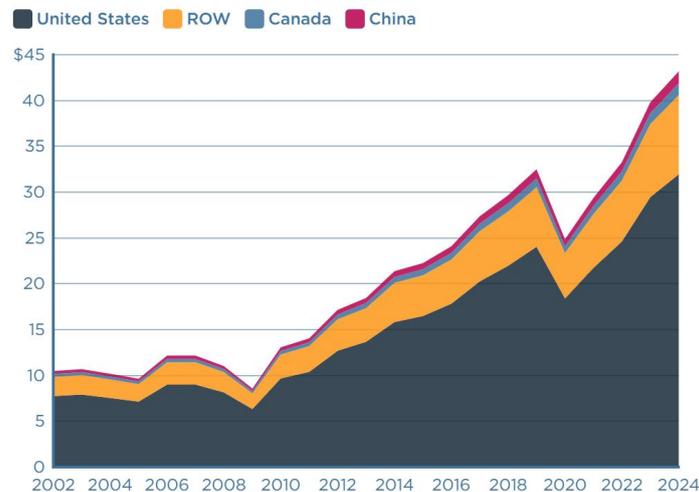
然而，这幅图仍然没有描述全貌。图 2 中的数据显示了墨西哥向所有目的地出口汽车的附加值。但如果只看销往美国的车辆（图 3），就会发现美国在墨西哥出口的外国投入中占 74%。这一数字可能低估了墨西哥汽车出口中的美国制造含量，因为它依赖于 2014 年的海关数据。在 NAFTA 被 USMCA 取代之前，USMCA 将北美区域价值含量（Regional Value Content, RVC）的最低原产

地规则要求从 60-62.5%收紧至 75%。计算美国从墨西哥进口车辆的总增值中隐含的美国原产份额，结果约为 38%（即 51%出口到所有目的地的车辆中外国成分的 74%）。同样，只有不到 2%来自中国（51%出口到所有目的地的车辆中外国成分的 3%）。

图 3 墨西哥出售给美国的汽车中，74%的外国附加值和 38%的总附加值来自美国按原产国划分的墨西哥对美国汽车出口的外国投入份额（百分比）。基于 2014 年海关数据。



A. 2002-24 年（年度）墨西哥对美国汽车出口中按原产地计算的隐含附加值含量，10 亿美元



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打算如何对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机动车贸易施加新的限制，以及他的威胁是否应被视为进一步谈判的前奏。但鉴于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中美国制造的高含量，任何保护主义措施都必然会显著影响美国公司。经济研究表明，当进口在国内含量中占有很大份额时，关税对两个贸易伙伴的就业成本都更高。此外，对墨西哥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将渗透到价值链中，损害使用这些零部件的美国汽车行业投入品生产商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的其他生产商，而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进口商和出口商为受新关税影响的投入品寻找替代品的难度。

为了避免这些成本，特朗普政府应该考虑在对进口汽车和其他商品征收新关税之前，与美国产业界进行磋商，并与墨西哥进行谈判。

本文原题为“Restricting Imports of Mexican Vehicles Will Harm US Manufacturers”，本文作者 Julieta Contreras 是 PIIE 的统计学家。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发表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期待特朗普的需求，而非规则，主导美国贸易政策

Alan Wm. Wolff/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在过去 80 年中，国际贸易关系主要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遵循既定规则来推动，各国在全球化的框架下进行合作与谈判。然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从基于规则的谈判转向基于需求的“权力政治”模式。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强调通过具体的需求来施压其他国家，而非依据先前达成的贸易协议或国际贸易规则。这种以“需求”为主导的政策架构，标志着美国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新定义，突显了大国博弈而非传统法治原则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地位。随着特朗普第二次总统任期的临近，国际社会开始适应这种新的政策范式，全球贸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编译如下：

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给国际贸易关系带来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的 80 年里，贸易谈判主要聚焦于降低贸易壁垒和改善贸易规则。现在，对美国而言，重点是当下的需求——停止芬太尼的运输、控制移民流动（指向墨西哥和加拿大）以及打击毒品流动（指向中国），或者继续使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的货币（针对新兴国家，“金砖国家”）。其他国家即便提及与美国的先前贸易协议，也无济于事，即便是特朗普更新后的《美墨加协议》（USMCA）。这些谈判中适用的标准不再是各国之间此前达成的协议，而是由大国政治主导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并不是遵循法治原则，而是遵循一个法则（用法语词汇）——“sauve qui peut”，或者用简单的英语说就是“各自保命”。这就像沉船的船长在没有更多救生艇时给剩余乘客的忠告。

根据美国于 1947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贸易体系的规则，所有国家只要给予其他国家“最惠国待遇”（MFN），即不歧视的贸易待遇，就能获得同等待遇。166 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承诺不使用关税作为武器，而是通过合同将其约束在商定的（大多较低的）水平上，并且不歧视供应商，除非是完全取消关税并以自由贸易为目标。

当时的想法是，在“自由放任”或尽可能“放手”的政策下，贸易不受限制的程度越高，所有人都将在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中受益。总体而言，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尽管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是如此，美国和世贸组织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开放贸易会带来利益的假设和政策在美国国会未能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协议时开始动摇，而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取消了美国的参与。随后，世界见识了特朗普加征关税——针对钢铁、铝和来自中国的商品。拜登政府在大体保持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同时，针对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在半导体、电池、太阳能面板及其他少数商品上增加了关税。

17 世纪的法国国务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贸易政策奠定了基础，他在重商主义的基础上指导法国的贸易：在寻求消除巨额贸易赤字的同时，阻止进口，支持国内制造

业。据我们所知，科尔伯特并没有提到“友岸政策”，就像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也显然没有采纳这一政策。

美国并非现代史上第一个将权力作为贸易关系基础的国家，只是第一个公开这样做的国家。中国在多次贸易交涉中运用了贸易胁迫——例如，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澳大利亚质疑新冠病毒来源、立陶宛欢迎台湾办事处等问题，以及当 WTO 对中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时，中国也曾向 WTO 提起反诉。美国当选总统曾欣赏这样一个强势领导人的风格。虽然美国多次实施经济制裁，但这些制裁并未用于商业利益。通过威胁，特朗普现在正在抹去美国在商业事务与外交制裁之间的界限。

世界正处于适应第二任特朗普总统任期的初期阶段。毫无疑问，尽管特朗普尚未上任，但政策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渥太华、墨西哥城和欧洲著名机构的反应表明，外国官员所依赖的不是法治，也不是合同义务或国家的承诺，因为这些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谢恩鲍姆与特朗普进行了接触，试图探讨有哪些特殊交易能缓解美国的压力，为特朗普 1 月 20 日上任做好准备。欧洲央行（ECB）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讲话也体现了同样的态度。

全球贸易体系在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任期的中国第一阶段协议中幸存了下来，也会在美国与欧洲达成增加液化天然气或军事设备购买的特殊协议后继续生存。这些采购对双方其他方面的利益也是有价值的。

更需要关注的是“一次性”贸易协议的扩展成为新常态。今天能接受的协议，明天可能就无法接受。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境的商业，都依赖于确定性。过去 80 年中，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正是基于这一点。确定性来自规则，并且这些规则大多会被遵守。尽管这一体系存在诸多缺陷，当前和以往的美国政府贸易官员都能轻易指出这些缺陷。修复它们应当是优选的方式。忽视或抛弃这一体系则是替代选项，而其带来的损害可能是广泛的。或许从关税开始，但多种可见或不可见的措施也可能被使用。关税是公开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低迷的水平下，贸易仍可能继续进行。而标准、采购做法、补贴、偏袒等方式，可以在无数层面上扭曲或直接阻止贸易，而其中许多方式是难以识别和理解的。

权力可以用来建设，也可以用来摧毁。1971 年，尼克松总统征收了 10% 的进口附加税。它最终导致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一轮重要的多边贸易谈判。然而，权力同样可以带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经济能够受益。

本文原题为“Expect Trump's demands, not rules, to govern US trade policy”。本文作者 Alan Wm. Wolff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新风险而非去风险：美国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挑战

Cullen S. Hendrix/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石墨对电池、炼钢等行业至关重要。随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寻求降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风险，他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事实：降低风险是一种用词不当的说法。美国正在做的是新的冒险：用来自中国的熟悉风险取代前沿市场中更模糊、更不为人所知的风险。编译如下：

石墨对电池、炼钢等行业至关重要。本月，由于莫桑比克的内乱，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西拉资源（Syrah Resources）将关闭一座石墨矿，并拖欠美国政府支持的贷款，这导致美国试图在不依靠中国的情况下实现石墨供应多元化的努力受到了重大打击。这一事件表明，随着美国政策制定者寻求降低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风险，他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一个事实：降低风险是一种用词不当的说法。美国正在做的是新的冒险：用来自中国的熟悉风险取代前沿市场中更模糊、更不为人所知的风险。

巴拉玛（Balama）石墨矿显然是美国试图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多样化的核心。这些供应链由中国主导，并且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日益武器化。从莫桑比克矿山到路易斯安那州维达利亚的石墨加工厂，西拉资源公司从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和能源部获得了近 2.5 亿美元的贷款。

在 2023 年新德里 G20 峰会上小约瑟夫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将为巴拉玛（Balama）石墨矿提供 1.5 亿美元贷款。这笔贷款于 2024 年 11 月敲定，现在已经处于违约状态。西拉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从 2022 年 11 月 1.80 美元的高点下跌至 12 美分，此前，《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出台，关键矿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莫桑比克对于美国实现减少对中国石墨依赖的想法至关重要。尽管中国有出口限制，美国仍将继续从中国进口大量石墨。虽然美国从莫桑比克进口石墨只占美国总体石墨进口量的一小部分，但从 2021 年到 2022 年美国从莫桑比克进口石墨翻了两番，从 2022 年到 2023 年又翻了一番。2024 年则出现了严重问题。截至 9 月，莫桑比克仅生产了其 2024 年用于电动汽车电池的石墨目标的 11%。

莫桑比克的高风险状况

事后看来，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拉玛（Balama）石墨矿上始终是一个冒险的方案。该矿位于莫桑比克最北部省份德尔加杜角省，距离首都马普托近 1400 英里，大致相当于纽约市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之间的距离。远离权力中心的德尔加杜角，长期以来一直是莫桑比克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尽管这里盛产丰富的红宝石、石墨和天然气。德尔加杜角省被边缘化始于葡萄牙统治时期，并在莫桑比克内战（1975-92）期间持续下去，这场内战有效地切断了莫桑比克北部与

该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就在 2018 年，其婴儿死亡率大大高于莫桑比克南部和中部。

德尔加杜角省是莫桑比克独立战争（1964-74）期间发生激烈战斗之地，在此期间，德尔加杜角省和坦桑尼亚的邻近省份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的行动基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是一个马列主义叛乱组织，自莫桑比克独立以来一直统治着莫桑比克。该省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天主教为主的马孔德族和以穆斯林为主的姆瓦尼族之间关系紧张，而这两个民族都不是以特松加族主导的解放阵线的主要代表。自 2017 年以来，该地区一直是伊斯兰国当地分支发动的伊斯兰叛乱活动的发源地。叛乱分子的行动导致巴拉玛（Balama）石墨矿多次暂停作业。

对资源诅咒的研究表明，宝贵的矿产资源远离首都和主要族裔群体，长期欠发达和政治边缘化，以及当地主要族裔群体与国家政府之间关系紧张，这些因素不断混杂，但最终，巴拉玛项目并不是因为伊斯兰国而失败。相反，西拉资源公司指出当地农民抗议土地使用和重新安置——在受采掘业影响的地区，这是一场非常常见的冲突。——以及自去年 10 月以来，在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完成后发生的全国抗议浪潮，迄今已造成至少 110 人死亡。叛乱无助于解决问题，但最终它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不可抗力的声明，对于巴拉玛（Balama）石墨矿倒闭而言，意味着不可预见的情况或“天灾”。然而，任何合理的评估（包括我自己的）都表明，德尔加杜角地区的政治环境对巴拉玛（Balama）石墨矿的运营带来了重大挑战。东非石墨资源丰富，特别是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在这三个国家中，坦桑尼亚的风险最低，莫桑比克的风险最高，主要是由于德尔加杜角的武装冲突动态。虽然我误诊了特定的向量，但我正确地识别了治理环境最具挑战性的地区。

这些情况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严峻的现实：正如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真正的去风险化。相反，与占主导地位的、成熟的（尽管日益敌对的）生产国（中国）相关的已知风险已被新兴和前沿市场和生产国鲜为人知的风险所取代。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石墨生产国，但中国仍在进口石墨，以满足其更占主导地位的加工工业。中国的石墨精炼商已与东非和巴西更成熟的生产商达成了长期采购安排。作为后来者，美国因此被推向了更多的前沿项目和背景，而这些背景很少被理解。

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Colorado School of Mines）最近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问听众——主要是西方矿业专业人士、规模较小的参与者以及少数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他们或他们的团队是否有与中国做生意以及在中国做生意的丰富经验。几乎每个人都举起了手。我问了莫桑比克同样的问题，只有三个人举起

了手，且都是非洲学生。西方矿业公司、美国政府和公民社会都必须适应这一新的、更加多样化的、可能更具挑战性的风险格局。他们也不会有特别深厚的专业知识可供借鉴。这就是为什么矿业劳动力多元化对美国矿产安全的未来如此重要的众多原因之一。

“你知道的魔鬼总比你不知道的魔鬼好”这句格言的一些变体至少从 16 世纪就开始出现了。随着美国寻求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样化，五个世纪后这似乎是恰当的，并为缓和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其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移除的言论和现实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本文原题为“New-risking rather than de-risking: The challenges in US efforts to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ese critical minerals”。本文作者 Cullen S. Hendrix。Cullen S. Hendrix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气候与安全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科罗拉多矿业学院佩恩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重点是国际市场、自然资源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变化对经济和安全的影响。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发表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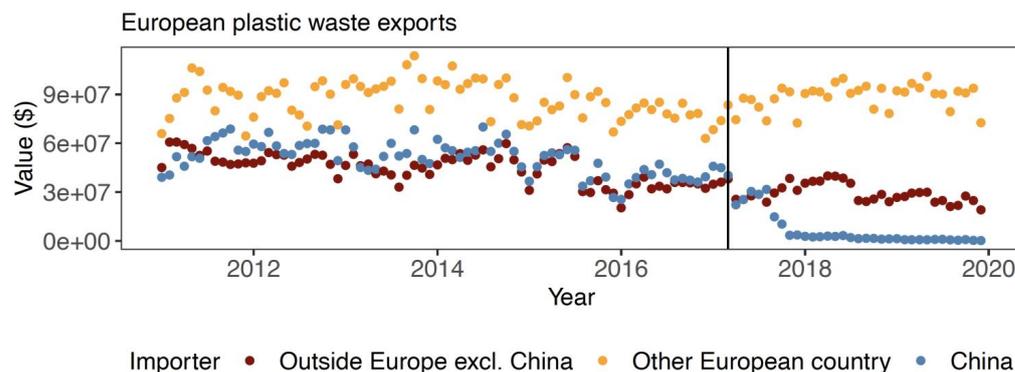
中国废塑料进口禁令对欧盟政策的启示

Konstantin Sommer / 文 王琬婷 / 编译

导读：2017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这导致塑料垃圾在国家之间的大量重新分配。本专栏讨论了欧盟计划对《欧盟废物运输条例》进行改革的经验教训。虽然欧洲内部的废料贸易总量并没有因为禁令而增加，但有确凿证据表明，在废料处理过程中存在“废料避风港”效应。欧洲内部法规的统一可以帮助减少向低监管国家的外包，而对可回收材料含量的强制性要求可以解决禁令可能会增加废料处理量而不是回收量的担忧。编译如下：

2017年，中国宣布将从2018年1月起禁止进口包括所有塑料垃圾在内的几种垃圾。这对全球垃圾贸易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为当时中国进口的全球贸易塑料废物占全球废料贸易总量的一半（根据Comtrade的数据，见《联合国2023》）。在本专栏中，我将讨论这个政策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欧洲大陆将一半的塑料废弃物运往中国（见图1）。因此，现在这些国家必须迅速重新分配这些废物，而由于政策限制，大部分重新分配必须在欧洲本身和经合组织内部进行。

图1 欧洲塑料废物的跨境贸易，按进口商分组



注：竖线表示中国开始实施进口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联合国，2023年）

这一禁令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欧盟目前计划的塑料废物出口政策变化相似。日前，欧盟宣布，将在三年内（2026年5月至2029年5月）禁止向经合组织以外地区出口所有塑料废物。在此之后，他们将受到严格的监管。与中国的进口禁令一样，这一政策可能导致欧洲境内废料处理的大量迁移。

根据经济学界理论上的预测，在这两项政策出台后，大部分重新分配的废料将被送往废料处理成本较低的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成为成本较高国家的“废料避风港”。欧洲内部可能成为废料天堂的地区可能会面临污染加剧的情况，中国各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Unfried and Feicheng 2024）。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较低的加工成本往往与较弱的环境监管密切相关。

Kellenberg（2012）和 Teshima 等（2022）在过去分别发现了废物和（电池）回收方面的“污染避风港”效应。但对于其他类型的污染，现有研究很难找到这种影响的因果证据。因此我们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这种效应。

Sigman and Strow (2024)指出了此类禁令的另一个潜在问题，即进口禁令导致美国垃圾填埋活动的增加。因此，在欧洲内部，无论是在进口禁令还是出口限制，预计都会产生这种情况。

在最近的研究（Sommer 2024）中，我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研究进口禁令对欧洲内部废料贸易的因果效应。这项研究使我能够评估禁令是否导致了欧洲内部的“污染避风港”效应以及废料贸易的变化是否是由其他因素驱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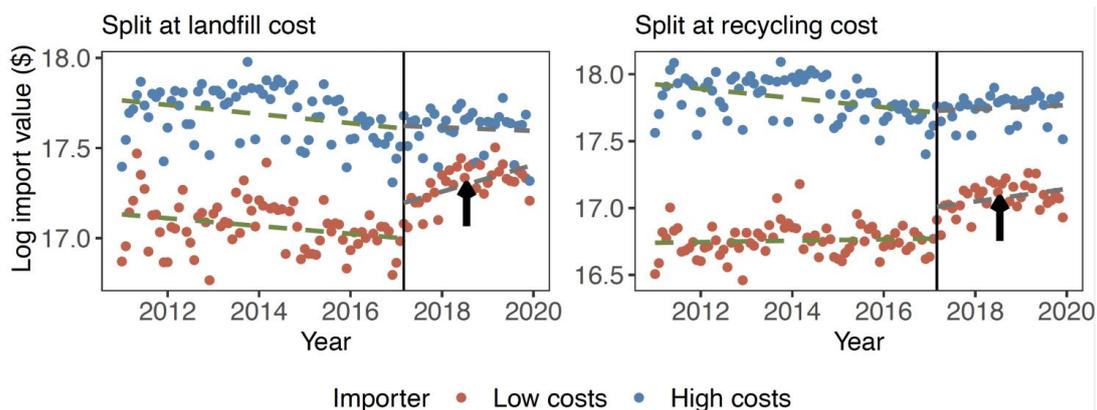
数据和方法

研究欧洲废料贸易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获得在垃圾填埋场处理一吨废物的私人平均成本数据（包括税收和平均门票费），以此作为一般处理成本的代理变量。此外，我还使用废物处理部门的工资替代回收成本，并获取一个国家的剩余垃圾处理能力，包括填埋和焚烧，以及其他相关的控制变量。然后，我研究了塑料废弃物的月度双边贸易，重点关注中国明确禁止进口的 HS 编码。

从图 1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废料进口并没有弥补中国进口的整体下降，这表明废料所属国吸收了更多的废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内部的贸易模式没有发生变化。

图 2 显示了欧洲内部加工成本与废料贸易之间的关系。为此，我将样本中的所有国家按这些指标的中位数进行划分，每个面板分别有一个变量。然后，我指出了在禁令实施后，我预计会增加的国家的废物进口平均增幅。左图显示，废物进口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垃圾填埋成本低的国家进口量增加，而垃圾填埋成本高的国家进口量并没有增加。在回收成本较低的国家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尽管程度较小。

图 2 按进口商特征分列的欧洲内部塑料废物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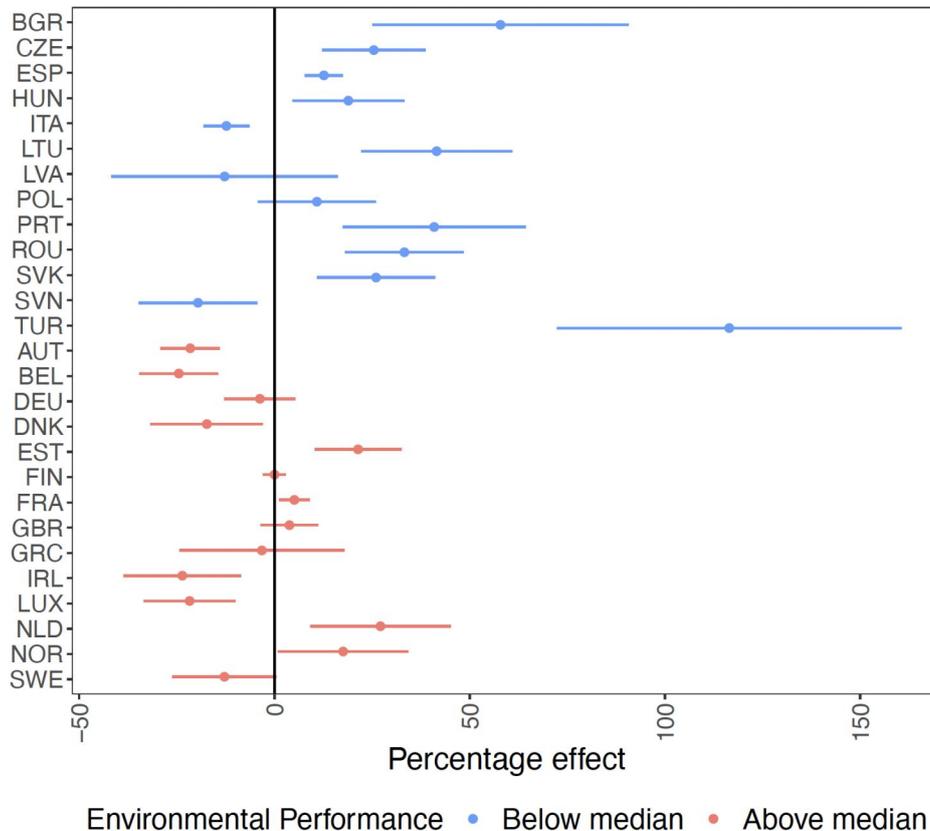
注：竖线表示中国开始实施进口限制。

资料来源：根据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联合国，2023 年）

在我的论文中，我将这些成本差异与其他潜在驱动因素分开，研究这种相关性是否代表一种因果关系。在双重差分模型中，我利用其他未受影响的商品贸易来控制未实施进口禁令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我研究了进口禁令对欧洲内部

废料贸易的影响，首先是总体影响，其次对不同国家按特征来区分。为此，我使用了废料处理成本和处理能力的差异。

图 3:中国进口禁令对欧洲塑料废物进口的预测变化



Note: Based on results in Sommer (2024) and (Block et al. 2024) for data on environmental 注：
基于 Sommer (2024) 和 Block 等 (2024) 关于环境绩效的数据

结果

根据描述性图表 1，我发现欧洲内部的废物贸易总量并没有因为这项禁令的实施而增加。然而，我确实发现了在废物处理方面产生“避风港效应”的有力证据。禁令颁布后，处理成本较高的国家开始向成本较低的国家出口更多废物。这种关系在禁令之前并不存在，如果我控制其他国家如人均 GDP 等特征，这种关系也不会消失。就回收成本而言，估计指向相同方向，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些影响的程度是相当大的，这意味着与禁令之前及其他商品贸易相比，填埋成本存在平均差异的一对国家开始向成本较低的国家多交易约 20% 的塑料废弃物。与此同时，我发现从低成本国家流向高成本国家的废物质量有所下降。这也可能意味着进口国在处理废物时产生的负面外部效应增加了。

我还发现了处理能力的预期效应，表明处理能力较低的国家开始向处理能力较高的国家出口更多废料。这可能表明，各国的国内可处理的废物数量受到限制，也进一步暗示塑料废物的处置率（相对于回收利用）总体增加。

在图 3 中，我展示了这些效应对单个国家的影响，其中有两个关键的启示。首先，那些在禁令实施后成为“废物避风港”的国家，其环境绩效通常比那些主要减少废物进口的国家低得多。这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些国家废物进口的增加很可能伴随着污染的加剧。其次，土耳其在这一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土耳其成为欧洲塑料垃圾的重要进口商。然而，将土耳其的影响其他样本的影响分离并不会显著改变上述结果。

政策结论

我的研究结果对政策有重要意义。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了欧洲废物出口禁令的两个潜在副作用。首先，即使这些法规旨在通过禁止向管辖范围以外的国家出口来防止“废物避风港”效应，但此类法规仍然会对欧洲和经合组织内部废物处理的分布及其相关外部因素产生影响。

其次，至少在短期内，这种禁令可能会增加垃圾处理量，而不是回收量因为我发现废物贸易对处理能力和价格都有强烈反应。

为了克服这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欧洲和欧盟内部环境法规的实质性协调可能有助于减少向低法规国家的部分外包。在实施出口禁令的同时，对回收材料的强制性含量要求以及更广泛的生产者延伸责任计划可能有助于解决第二个问题。

本文原题为“[The Chinese plastic waste import ban: Lessons for EU policy](#)”。作者为 Konstantin Sommer 是 CPB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兴趣是国际和环境经济学。迄今为止，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的环境政策差异及其对经济表现、泄漏和外包的影响。他还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博士生，并在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工作。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刊于 CEPR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与非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Vito Amendolagine、Andrea Presbitero、Roberta Rabelotti /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在过去 15 年中，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大幅增加，主要用于资助基础设施项目。本文表明，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与非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参与度增加有关，特别是在下游领域。因此，中国的贷款可能有助于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提升。编译如下：

过去 15 年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激增，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本文显示，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与更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下游部门。因此，中国的贷款可能有助于非洲国家的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贷款国之一，特别是对非洲国家。在 2017 年以后出现放缓的情况下，2023 年中国对非洲的贷款再次增长。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中国的官方海外贷款主要针对交通和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2007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开发银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资金是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开发银行资金总和的 2.5 倍，远远超出了多边开发银行在该领域的资助。

基础设施贷款有潜力降低贸易成本，并加强贸易一体化和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在一篇近期的论文中，我们探讨了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是否能够帮助非洲国家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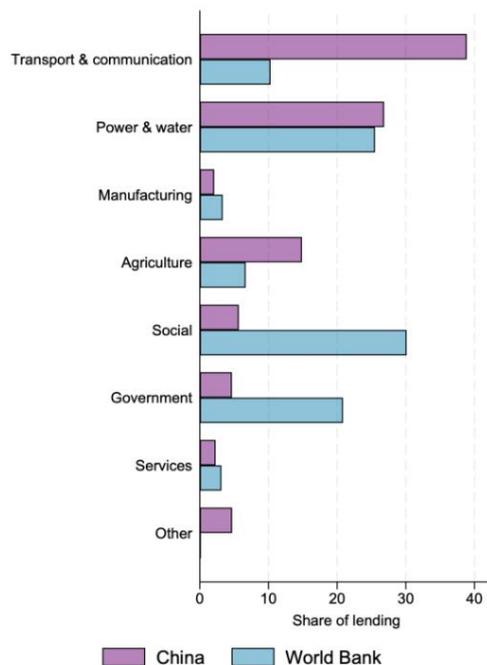
中国为非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背后的性质和动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肯尼亚连接内罗毕和蒙巴萨的标准轨距铁路项目等著名案例就是例证。该项目引发了肯尼亚可能使用蒙巴萨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猜测（Brautigam 2022）。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纳伊姆（Naim, 2009）将中国的金融流动描述为“流氓援助”，声称它们主要是由自身利益驱动的。然而，后续的研究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并认为其并不成立（例如，Dreher 等人 2021）。

虽然中国的贷款通常涉及不寻常的保密条款和抵押品安排（Gelpern et al. 2023），但必须认识到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多样化的，不应被自动归类为掠夺性或有问题的。例如，Vines 等人（2022）讨论最近一笔用于在内罗毕修建高速公路的中国贷款，更符合世界其他地区常见的公私合作模式，规模也较为可控。

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专注于基础设施领域，可能推动更强的贸易一体化。通过结合中国-非洲研究倡议（CARI）的贷款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中国对 37 个非洲国家的贷款，以及世界银行项目和运营的类似贷款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和世界银行在各个领域的贷款配置存在显著差异（图 1）。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贷款用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而世界银行的

贷款中只有大约 10%用于这一领域。相比之下，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社会项目，如教育、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领域，这些领域在中国贷款中的投资则较少。

图 1 中国和世界银行对非洲的贷款：行业分配



资料来源：中非贷款（CLA）数据库和世界银行项目与运营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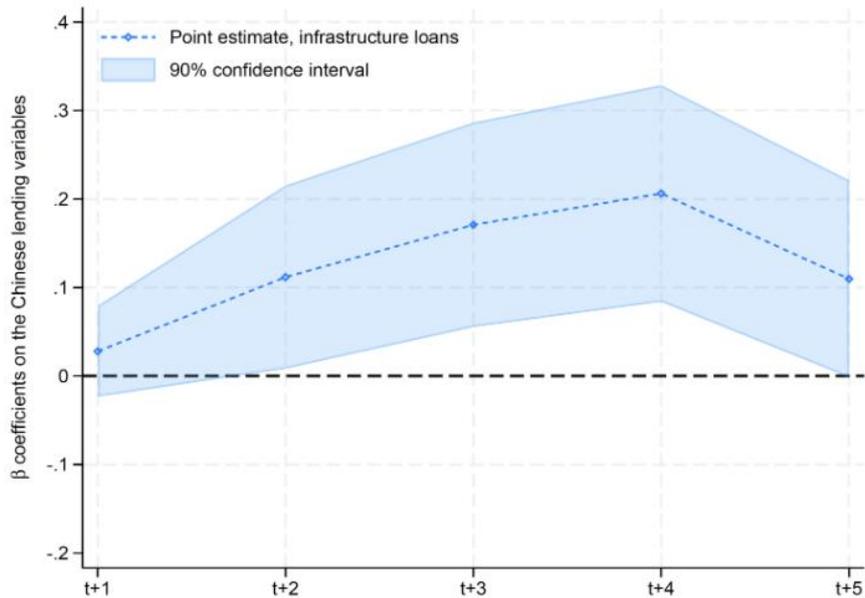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增强非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为了评估中国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是否与全球风险投资的参与有关，我们将贷款数据与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和 Eora 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数据进行匹配，区分上下游价值链的参与度。数据显示，虽然非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主要是上游——主要基于自然资源的出口——但大多数国家的下游部分都有所增加。这一变化表明，非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向更接近最终需求的生产阶段专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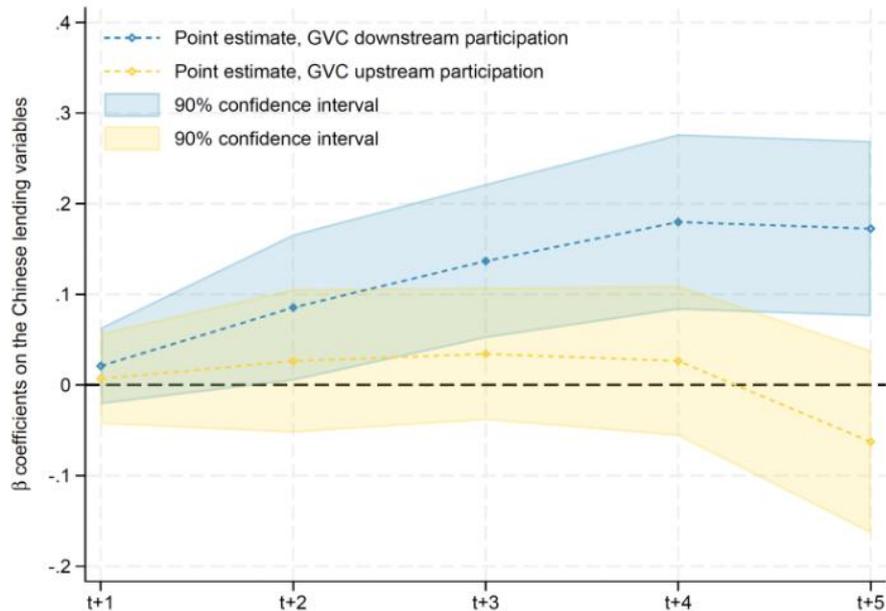
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是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世界银行的贷款则不是这样，这可能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的规模较小，而且所资助的基础设施类型不同。针对运输和通信部门的贷款在降低贸易成本和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方面更有效，推动了这一结果。在经济方面，中国基础设施贷款增加一个标准差，四年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增加 0.11 个标准差（图 2，面板 A）。

图 2 中国基础设施贷款和全球价值链参与

A)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B) 下游与上游全球价值链的参与



注：图表绘制了中国基础设施贷款的系数（以百万美元衡量）——以及相关的 90%置信带——来自三个独立的回归，其中因变量是：国外和国内中间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的远期变化（全球价值链参与，A 组）；外国中间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份额的远期变化（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B 组）；以及国内中间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百分比份额的远期变化（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B 组）。所有这些变化被计算为第 t 年和第 $t+n$ 年 ($n=1, \dots, 5$) 之间的差异。所有回归都包括一组控制变量（包括中国非基础设施贷款和世界银行贷款）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

图 2B 显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主要集中在下游部分，即利用进口商品生产最终产品进行出口。专注于这种参与可能促进出口增长和生产率提升。这种侧重有可能提升出口和生产率。资源丰富但技术不够先进的国家若能更多地关注下游产业——即那些为产品增值的产业，就能够生产更先进的商品。通过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后期阶段的参与度，非洲国家能够更好地从全球贸易和一体化中获益。

支持非洲工业化与就业创造的潜力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引发了有关其贷款政策及其对该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问题。我们的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中的一个关键方面：中国贷款在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非洲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方面的作用。

非洲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如果中国的贷款能够促进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并加强对下游价值链的参与，它们将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工业化和就业创造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为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应铭记政策应以创造有利的商业环境为目标。这将使非洲国家能够充分利用新基础设施带来的积极影响，最终提升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

本文原题为“Chinese infrastructure lending and Africa's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本文主要作者 Vito Amendolagine 是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Foggia (Italy) 的经济学副教授。他的研究重点是国际贸易和发展经济学，特别关注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VOX。[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绿色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型

Emilia Soldani, Maxime Nguyen, Tomomi Tanaka, Orsetta Causa /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向绿色经济的转型将涉及将劳动力从高污染行业重新分配到“绿色”工作岗位。为了尽量减少这一转型对个人和社区的成本，政策需要支持被解雇工人的再就业，同时管理污染行业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结构性和政策性因素在塑造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作用，并揭示了各劳动力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教育是从非就业状态向绿色工作转型的最重要个人驱动因素，而地区之间在产业专业化上的差异要求采取基于地点的政策干预。编译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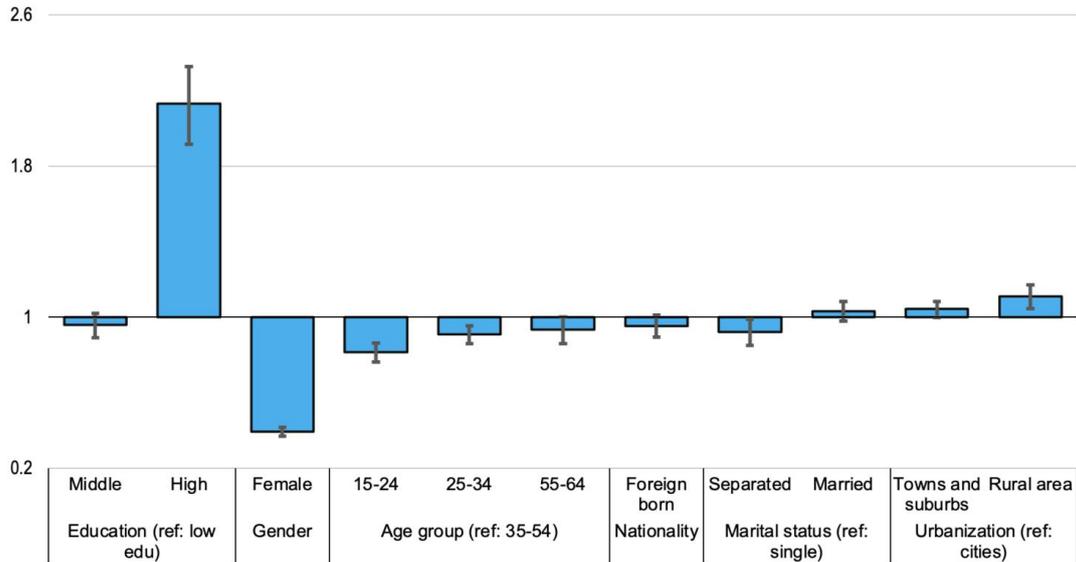
向绿色经济的转型是必要的（Kanzig 2024）。这一转型将需要在商品和能源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上进行重大改变（European Parliament 2024），同时还需要重新分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尽管整体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但这些影响可能会集中在某些经济活动、地理区域和特定特征的工人上，从而加剧结果和机会的不平等。特别是，转型预计会导致高污染行业（通常被称为“棕色”工作）的职位收缩，并且预计会扩展所谓的“绿色”工作岗位，即涉及绿色活动的工作岗位（根据 ONET 分类）（Valero et al. 2021, Vona et al. 2018, Vandeplass et al. 2022, Causa et al. 2024, Causa and Phillips 2024, ONET 2010）。劳动力市场中的公平转型应尽量减少个人和社区的成本。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政策改善工人资源的配置，支持被解雇人员的再就业，特别是向绿色工作岗位转型，同时管理和减轻污染行业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由于各地区在产业专业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干预应根据具体地区情况进行调整。

从事高污染职业的工人往往教育水平较低（Causa et al. 2024）。在失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面临比非能源密集型和交通行业工人更大的收入损失（Barreto et al. 2024）。综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有效的教育体系和技能提升项目，能够有助于减轻这些损失及失业后的负面影响，同时加速绿色转型。近期对一大批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Causa et al. 2024）发现，在考虑国家特定效应和个人特征后，来自高污染工作的失业者在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较高且更多成年人参与培训的国家，长期失业的风险较低（表 1，图 A）。为了促进工人与新工作匹配，培训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应与平衡和充足的收入支持及失业救济相结合，这与从失业到就业的转变概率较高相关，特别是在长期失业者中（表 1，图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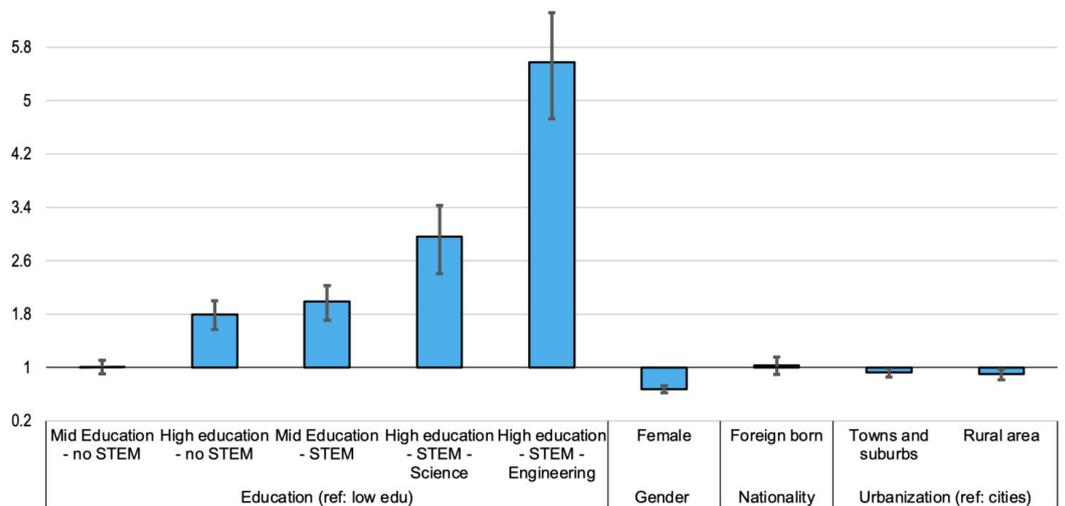
此外，促进教育和培训机会的政策有助于满足绿色工作岗位需求（如 Causa et al. 2024 所定义），因为在控制其他可观察特征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尤其是 STEM 领域的工人，获得绿色工作的可能性是其他工人的两倍（图 1）。事实上，在成人文盲率较低和算术能力较高的国家，失业到找到绿色工作的转型更有可能发生，而这类国家的工人也往往接受了更多的正式培训（表 1，图 A）。

图 1 从失业和非劳动力状态到绿色就业的转型

A) 从失业到绿色就业的转型



B) 从与学习相关的非劳动力状态到绿色就业的转型



在促进从失业到绿色工作的转型方面，除了教育和培训的关键作用外，劳动力市场制度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制度包括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失业工人的现金支持以及有效的集体工资谈判和社会对话制度。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对女性、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和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群尤其有利（表 1，图 A）。像培训、公共就业服务（PES）以及就业激励等政策，促使更多高学历工人从非就业状态转向绿色就业（表 1，图 B）。虽然这种关联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它表明我们需要更好地设计和有针对性地施行这些政策，以帮助那些易受影响的工人，尤其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

另一方面，在相对较高的就业保护、产品市场和职业准入规定限制了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活力的国家，失业到绿色工作的转型可能较不容易（表 1，图 C）。这一关联对脆弱群体，特别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和刚从学习转向劳动

力市场的年轻人来说尤为显著。这些结果与就业保护立法对找工作率及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普遍影响文献相一致（Bassanini & Garnero 2013, Causa et al. 2022, Scarpetta 2014）。

表 1 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Policy areas and variables	Transitions from unemployment to green jobs					Transitions from studies to green jobs		Long-term unemployment risk after high polluting jobs		
	Probability to get any job Working-age pop.	Prob. That such job is green-skill				Young individuals		Working-age pop	Age 55+	Lower education
		Working-age pop.	Higher education	Women	Age <35	Probability to get any job	Prob. That such job is green			
Panel A. Education, skills and training										
Mean Literacy score	>	>	>>	>>	>	>	-	-	-	-
Mean Numeracy score	-	>	>>	>>	>	-	>	-	<	<
Adults' participation in formal training	>	>	>	>>	>	>	-	-	<	<
Share of population with tertiary education	>	-	>	>	-	>	-	-	<	<
Panel B.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ALMP, Spending on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	-	>	-	-	-	-	-	-	-
Unemployment benefits 67% AW; 1y unemployment	>	-	>	-	-	+	<	<	-	-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on regular workers	<	-	-	<	-	<	-	>	-	-
Average tax wedge (67% of average wage)	-	-	-	-	>	<	-	>	-	>
Centralized wage bargaining	-	>	<	>>	<	-	-	>>	>>	>>
Panel C. Policy barriers to business entry and competition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 overall index	<	<	<<	<	<	<	-	>	>	>
Occupational Entry Regulations	<	<	<	<<	-	<	-	>	>	>
Panel D. Housing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	-	>	>	-	>	-	-	<	<
Public spending on housing allowances	>	-	-	<	-	>	-	<	<	<

劳动力市场文献表明，促进居民流动的住房政策有助于劳动力的空间重新配置，推动商业活力，提高工人把握工作机会的能力（Causa et al. 2021, Causa et al. 2020, Andrews et al. 2011）。在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也是如此：例如，强烈的房价动态阻碍了从学习到工作的转型，高房价可能成为地理流动的障碍。社会租赁住房 and 住房津贴（即与住房相关的货币福利）地提供增加了从失业到工作的转变几率，包括绿色工作，并且住房津贴的好处比社会住房更为广泛。同时，这些住房支持政策与显著较低的长期失业风险相关，尤其是对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而言。最后，减少过于严格的租赁市场规定也可能打破地理流动障碍，促进从失业到就业的转型（表 1，图 D）。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已知能支持劳动力市场包容性和效率的结构性政策也可能支持顺利和公平的绿色经济转型。然而，它们也突出了绿色经济转型和气候减缓政策对不同教育和技能背景以及地理区域（如具有不同产业专业化结构的地区）的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不均衡。过去的成功政策经验可以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量身定制的方法，支持一个高效和公平的劳动力市场转型过程。

本文原题为 "Labour market transitions in a greener economy"。作者为 Emilia Soldani, Maxime Nguyen, Tomomi Tanaka 和 Orsetta Causa。Emilia Soldani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结构监测部门的经济学家，拥有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Maxime Nguyen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结构监测部门的顾问，拥有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统计学和经济学工程硕士学位以及巴黎高等商学院的管理学硕士学位。Tomomi Tanaka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初级经济学家，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在日本东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获得高级政策研究博士学位和公共政策硕士学位。Orsetta Causa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高级经济学家，拥有巴黎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本文于 2024 年 12 月刊于 VOX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0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IfW Kiel)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简介：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是一个研究全球经济事务、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教育的国际中心。该研究所尤其致力于为全球经济事务中的紧迫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基尔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预测、经济政策咨询、出版物、全球解决方案倡议、科学教育和公共关系。该研究所在其研究的基础上，向政策、商业和社会决策者提供咨询，并向更广泛的公众通报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发展。

网址：<https://www.ifw-kiel.de/>